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五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一三年六月

探險家與愛國者—— 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成立前後

羅 丰*

二十世紀初，西方探險家相繼進入中國進行科學考察。其在西北新疆地區之考察，特別是一九二七年斯文·赫定 (Sven Hedin, 1865-1952) 與中國學術機構聯合組成的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之活動，尤具時代及學術意義。當時中瑞雙方所簽訂的合作辦法，被認為是在國際學術合作上中國與西方國家簽訂的第一個平等協議。然而，以往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有些將之理想化；站在中方立場探究學者們在爭取本國權益方面的貢獻，而忽視外方代表斯文·赫定等人的立場，過分強調其被動應戰、被迫接受協議內容。本文利用當事人的自述、往來信件、檔案和新聞報導等材料，梳理事件前後細節。據此微觀分析可以清楚看到斯文·赫定在整個事件中扮演主導者角色，在一些艱困議題上他欲擒故縱，迫使對手放棄原有打算，並且最終實際上完全主導考察活動的整個學術走向和目標。以北京大學為首的中國學術團體，在特定背景下利用民意、學生運動和新聞媒體向北洋政府施壓，同時也迫使原合作單位中央地質調查所退出考查團。藉由本文的討論，冀能對中國現代學術史尤其是中外學術合作的複雜性有所深化。

關鍵詞：科學考察 斯文·赫定 民族主義 妥協 協議

* 中國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

本文係二〇一九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文獻史料整理與研究」(19ZDA215) 階段性成果。

一・前言

二十世紀初被認為是一個中國人覺醒的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民智，使得接受西方新知幾乎成為知識界共識。民主、科學則為人們追求的兩大目標，所謂現代性的標誌——民主籲求團結，科學籲求進步，當時中國知識界冀望一團結、進步之「中國民族」能適存於全球民族國家的資源競爭之中。

在另一方面，由於科學的先進性與正當性在當時不被懷疑，長期以來西方探險家挾科學之名所行之歐美以外區域的資源探索，似乎其正當性也不容時人置疑。科學探險活動雖然毫無疑問能增長世人對此世界的自然與人文知識，然而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潮流下、在重商主義民族國家的生產材料與市場之全球爭奪中，它有時也為相關國家之利益擴張扮演先行者角色。當時中國的自然科學菁英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長，因而能接受科學的普世價值。然而此時他們亦受民族國家思潮影響，對於西方人士在中國邊疆的探險活動有了受人侵門踏戶的屈辱感，因而又感覺難以接受。所以，如何一方面接受西學並追求本國科學發展進步，一方面發揮民主力量以維護民族國家主權，是當時參與此事（西方科學考察）之中國學者們的共同期許或兩難。

對於外國探險家在中國邊疆的探險活動，最初中國知識界的反應相當多元、複雜，且有一漸變過程，明顯地表現在對外國探險家的態度上。最初中央政府對他們保持高度警惕，雖頒發護照，且令地方政府派役護行，但對於探險活動的具體內容卻並不知曉。¹ 斯坦因 (M. A. Stein, 1862-1943)、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的探險所獲，對中國學術界造成很大的刺激。一九〇九年秋，伯希和攜帶四部敦煌寫本來到北京，讓羅振玉等著名學者大為驚歎，後者非但不以為忤且設宴款待伯希和。² 然而陳垣以《敦煌劫餘錄》為其所編敦煌文書目錄命名，就明顯是以之「寄憤慨之思」了。³

¹ 榮新江，〈19世紀末 20世紀初俄國考察隊與中國新疆官府〉，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4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295-301。

² 孟憲實，〈伯希和、羅振玉與敦煌學之初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4；榮新江，〈中國敦煌學研究與國際視野〉，《歷史研究》2005.4：165-168。

³ 陳垣，《敦煌劫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李濟，〈敦煌學的今昔——考古瑣談之二〉，《自由談》（臺北）19.2（1968），後收入張光直主編，《李濟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5卷，頁61。

總之，以考古學來說，如何利用國外學術奧援來促進學科發展，而又不失國家主權，自二十世紀上半葉至今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界領袖們思考的重要問題。對於外國考古學家在中國的考古活動，中國考古學家陳星燦曾告誡必須將政治與學術分開：一方面，在國外政治強權支持下的所謂探險和考察活動，既未得到中國政府許可，又採取許多非學術或非法手段，最終將「異文明」珍貴文物陳列在誇耀帝國偉業的博物館中，如此一來探險家們有意無意地成為其幫兇；另一方面，外國學者的探險和考古活動，不僅對中國考古學的誕生有刺激和促進作用，而且為人類古代文明與文化研究提供新材料，因此他們的貢獻自然不能被否定。⁴

另外，是否接受國際合作亦與學科性質有關。中國科學家們很早就曾討論科學的「國際性」(universalism) 與「地方性」(localism) 特質。如任鴻雋認為物理、化學、數學、天文等屬於國際性學科；而生物、地質等是具有地方色彩的科學。科學家的首要任務是將地區科學材料充分研究，然後才能在全球性的科學知識上有所突破。⁵ 中國地質學的地方性被認為是促使其受國際矚目的重要原因。⁶ 地質學也是與中國考古學關係最為緊密的學科。⁷ 可能受這類知識論述影響，著名考古學家夏鼐晚年曾認為，由於其區域特色，考古學應該由中國自己來推動，無需也不應採取國際合作的辦法。⁸ 總之由民國初年至一九八〇年代，中國學術界與外國科學家的合作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曲折且充滿爭議的過程。學術領袖們的思想活動伴隨著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制約或影響具體學術活動與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二〇年代的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之成立過程及其活動，便有其特殊意義；它發生在一新舊思想交匯的轉折年代，又涉及當時之國際政治、社會、科學與經濟等多重背景。因此仔細審視過程中各方人士之立場與其言行，探求影響個人行為與整體事件變化的諸多動因，可以讓我們對那時代，對當代中國學術、政治與國族認同有更深入的理解。

⁴ 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頁 50-51。

⁵ 關於二十世紀早期這類問題的討論參見楊翠華，〈歷史地質學在中國的發展 (1912-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 上 (1986)：333。

⁶ 楊鍾健，〈論研究有地方性科學之基本工作〉，《科學》1934.1：5-11。

⁷ 夏鼐，〈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考古》1979.3：193-196，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夏鼐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⁸ 夏鼐（作銘），〈介紹《周口店發掘記》〉，《考古》1985.4：383-384，後以題為〈評賈蘭坡等著《周口店發掘記》〉，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文集》。

當時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也使科學界看到了希望。當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 (Sven Hedin, 1865-1952) 率隊來華探險時，中國學術界挾民意支持終於找到一個有力的攻擊點。從宏觀層面來看，這是北伐之時，科學界對南方啟動之國民革命運動的響應；從微觀層面上來說，則是與強勢國家的代表訂定較為平等的學術合作協議之嘗試。與以斯文·赫定為代表的瑞方交涉活動便在這種複雜的局面下展開。這種遭遇既有文化衝突，也有對科學帝國主義 (scientific imperialism) 擴權、侵權行為的反彈，更有多元科學、政治勢力的博弈。雖然有諸多繁雜的背景因素，然而雙方在玉成其事的共同目標下靈活運用各項原則，最終讓二者各有所獲。

西北科學考查團⁹ 成立前後的若干史實研究，近年來有許多進展。¹⁰ 既往華文學界對此的研究討論，經常或多或少地將之簡化（以及理想化）為中方的勝利，因此忽略當年與事者之間的分歧，忽視斯文·赫定本人對此的豐富記述。更因和其他外國探險隊相比，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成績幾乎稱得上是空前絕後。或許聚焦於其豐碩成果，也讓研究者忽略當時與事者間的一些分歧。有些學者又將此視為一跨國、跨文化的互動事件，一場涉及文化主權、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國際角力；北洋政府和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支持此考察活動，被認為是藉機向此時形同自治的邊疆軍政勢力展現國家權威，如此之中國國內地緣政治讓斯文·

⁹ 關於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名稱，後人多用「考察團」稱之，其正式名稱應為「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印章見周珊、吳華峰編著，《黃文弼畫傳》（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29。本文中關於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中「考查」一詞，只有在涉及其正式名稱時使用「考查團」，而在一般性運用時則謂之「考察」，以示區別，引述他人文獻時以作者用法為準。

¹⁰ 有關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一般研究可參見劉衍淮，〈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的經過和考查成果〉，《師大學報》（臺北）20（1975）：75-92；劉衍淮，〈中國與瑞典合組之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1927-1933）〉，《地理學研究》（臺北）6（1982）：9-47；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學考察團組建述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3（1992）：22-29；王雲，〈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組成〉，《西北史地》3（1998）：89-93；李學通，〈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原件中的爭議〉，《中國科技史料》25.2（2004）：95-105；李學通，〈近代中外科學合作中的權與利——西北科學考查團再認識〉，《自然科學史研究》增刊 26（2007）：43-55；王忱編，《高尚者的墓誌銘——首批中國科學家大西北考察實錄（1927-1935）》（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5）；羅桂環、徐鳳先，〈20 世紀一次成功的中瑞合作科學考察——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張海鵬主編，《中國歷史上的西部開發——2005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209-219；羅桂環，《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綜論》（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赫定得以進行其新疆考察。¹¹ 這類研究之宏觀性的確有其價值，然而其關注焦點在北洋政府、國民政府與新疆地方軍政勢力的互動上，而這些互動許多皆發生在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成行以後，如此也忽視各方達成協議的複雜過程，或將之視為理所當然。

無論是斯文·赫定或是中方個別代表留下的文獻記錄，都不能簡單地被理解為作者們對當時發生之事的忠實陳述。它們之間的矛盾與差距，更表現其作者們（以及新聞媒體）之特殊群體認同，與個人、機構之利益立場。因此仔細閱讀當事人之自述、信件、檔案和新聞報導，梳理整個事件的許多細節，我們應能對此考查團及其成果之時代意義有進一步的認識，彌補宏觀研究中易被忽略的一些歷史面向。總之，當代中國之科學學術史與一九二〇年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有著無可置疑的密切交集；經過近百年之後，我們重新聚焦這一議題，目的並非品評人物是非，爭辯歷史事實，而是希望由事件過程中探究此學術史的多重面向。

二·斯文·赫定與漢莎公司約定的內幕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被迫放棄許多殖民地，此時該國透過發展民用航空工業來開闢世界各大洲間的航道，以彌補經濟損失，恢復其國際威望和地位，而東亞則是此航空商業擴張計畫的目標地區之一。¹² 一九二〇年代飛機只能在白天飛行，每年也僅能在四月至十月天氣良好時航行，因此提高飛行的可靠性和穩定性非常重要。¹³ 該國便在此考慮下，對於由柏林經波斯至北京的航線，期望能找到一條不經過積雪期長的西伯利亞之新路線，讓飛機在冬季也能起降。

雖然斯文·赫定當時已是聞名的探險家，但他的母國瑞典在政治上未能替他帶來多少與外國交涉的優勢。他所能依靠的是英國和德國；特別是戰後的德國為他的探險事業帶來新機。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在遠東的利益受到很大損失，但是他們又希望尋找新的增長點，開闢航線是在華新戰略的一部分。

¹¹ Justin M. Jacobs, "Nationalist China's 'Great Game': Leveraging Foreign Explorers in Xinjiang, 1927-193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3.1 (2014): 43-60.

¹² Hans-Liudger Dienel and Martin Schiefelbusch, "German Commercial Air Transport until 1945,"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78.3/4 (2000): 962. 感謝徐幼剛博士提供這條材料，下同。

¹³ Dienel and Schiefelbusch, "German Commercial Air Transport until 1945," p. 960.

羅丰

斯文·赫定的親德立場無疑使他成為德國代理人的最佳人選。斯文·赫定與他的老師李希霍芬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1833-1905) 都主張地質、地理知識對地緣政治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動作用。李希霍芬的地理學是為德國之擴張服務的，如青島成為德國租界後，他立即發表文章支持。斯文·赫定也是李希霍芬中亞鐵路計畫思想的繼承者。¹⁴

一九二五年德國想開闢與中國的空中航線，為此其代表拜訪了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斯文·赫定，雙方一拍即合。斯文·赫定很早就有籌劃一個龐大中亞探險隊的計畫，他理想中的這探險隊有十位以上的隊員和一個總部，大概花費會在100萬克朗 (Krona) 以上；他曾將這個計畫透露給他的德國朋友。¹⁵

該年九月斯文·赫定應邀來到柏林，與著名的飛機設計師容克 (Hugo Junkers) 商談開闢這條航線的可能性；在此他的構想得到德方熱烈支持。¹⁶ 斯文·赫定覺得主要工作將是如何說服中國人，尤其是讓其領導人認識到空中航線開闢的重要性。容克願意承擔這次探險活動的全部費用，準備用三架飛機來完成這項計畫，其中兩架歸斯文·赫定全權指揮。根據飛行結果繪製的草圖，對他制定將來的探險計畫非常有幫助。斯文·赫定不但是著名的探險家，也是一位傑出的地理製圖家。

此時德國也在嘗試開闢通往中國的其他飛行管道。一九二六年已經有德國飛行家駕機從柏林飛至北京。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大公報》上有以〈北京到柏林只要四天〉為題的報導。¹⁷ 試飛之後，德國打算先進行郵政飛行，計畫從一九二七年夏天起有四十次飛行，一九二八年轉入正常飛行，並希望在此基礎上延長飛行路線至海參崴及上海。飛行線路需經蘇聯伊爾庫茨克、烏金斯克，並要在貝加爾湖修建一座觀測氣候臺。也推算了郵政費用：單向行程花費約為三千五百鎊，一件書信需十四便士及二分之一。當然這份計畫需德、中、蘇聯三國共商，許多人認為此事在一九二九年以前難以實行。¹⁸

¹⁴ Tamara Chin, "The Invention of the Silk Road, 1877," *Critical Inquiry* 40.1 (2013): 214-219.

¹⁵ 參見 Hans Böhm, "Finanzierung der Zentralasienexpedition Sven Hedins: 'Strengste Geheimhaltung wird von allen Beteiligten als unerlässlich angesehen'," *Erdkunde* 57 (2003): 40. 感謝羅泰教授提供這條材料，德文由徐幼剛博士翻譯，下同。

¹⁶ 徐炳昶，〈敘言〉，斯文·赫定著，李述禮譯，《長征記》（收入《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北平：西北考察團印行，1931），頁1。

¹⁷ 《大公報》1926.09.03，第6版。

¹⁸ 《大公報》1926.09.29，第3版。

正當斯文·赫定與容克一切都談妥，不料容克公司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財務狀況出現問題，迫使他不得不放棄與斯文·赫定協商好的計畫。德國漢莎航空公司 (Lufthansa) 瞭解了這項計畫的內容，表示願意接手，支持由斯文·赫定領導之經中亞的中德空中走廊技術探險。這是斯文·赫定的公開說法。最近漢斯·玻姆 (Hans Böhm) 根據德國柏林外交部政治檔案館相關檔案的研究，表明當時的德國政府接管了資不抵債的容克公司，並履行了對斯文·赫定的財務支持承諾。這項計畫是斯文·赫定與當時的外交部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 (Gustav Stresemann, 1878-1929) 達成的，條件是斯文·赫定公開宣布計畫由漢莎航空公司負責，所有賬目都由漢莎公司正式結算。在漢莎公司的掩護下，德國的軍事人員參加探險隊，正式探索一條從北京至柏林的大陸飛行路線。按照這項協議，斯文·赫定將從帝國交通部獲得 150 萬馬克 (D-Mark)，這筆經費大約相當於二〇〇三年的 650 萬歐元。¹⁹

雖如此，表面上此探險活動仍由瑞典人組織，並受瑞典駐華公使館的保護；事關國家利益，斯文·赫定非常看重這一點。有兩到三名瑞典科學家參加這次行動，當然，主要成員是德國人，由多名德軍飛行員、一名氣象學家、一名攝影師和一名財務人員組成。在北京和迪化（烏魯木齊）之間建設四個無線電臺和氣象觀測站。原來打算中間站所需油料由飛機空運補給，後來覺得這並不切實際，改用駱駝運輸。²⁰ 如此改變了這探險的藍圖：1. 沿預先計畫的空中走廊，用駱駝隊進行探險，在合適地點建立汽油庫中間站，並進行地貌地形測量、調查；2. 為首次飛行運輸汽油進行考察；3. 由柏林至北京的往返首航。

接著與漢莎公司討論了探險活動的所有細節，如設備、儀器、駱隊組成、旅費、郵費及參加人員的報酬等等。過程中所有的困難都預加準備，唯未注意其溝通的對象機構地質調查所是否有全權代表性，以及當時中國政、學兩界之錯綜複雜關係。斯文·赫定後來回憶稱，如果當年對中方抵制有預判的話，那麼整個行動計畫就會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制定，至少可以先通過外交管道將各種事情談妥，以後就好辦多了。²¹ 斯文·赫定與漢莎公司過於樂觀而錯估形勢。

¹⁹ Böhm, "Finanzierung der Zentralasienexpedition Sven Hedins," p. 42.

²⁰ Sven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art I, 1927-1928* (Stockholm: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43), pp. 1-2; 斯文·赫定著，徐十周譯，〈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誕生經過〉，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50-551，後者是前書前兩章的中譯本。

²¹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3; 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52。

斯文·赫定和德國人達成的協議，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雖然整個考察活動斯文·赫定本人不收取任何報酬，但他有權以公開形式發表探險經歷，而其他隊員則沒有這樣的權利。即使是其他團員要寫回憶錄，也要等到探險活動結束兩年以後才能發表。同時斯文·赫定還有權利，在探險結束以後用特定形式發表探險隊中所有科學成員的研究結果；這部系列著作將以《斯文·赫定探險隊對中國西北省份的科學探險報告》為叢書名。作為著名地理探險家的斯文·赫定，顯然知道他自己最想得到的是什麼，而德國航空專家熱衷的則是航線沿途的氣象學訊息，包括盛行風、雲團、沙暴及暴風雪等影響飛行的因素。當探險隊人員抵達北京時，眾多裝備也同時運達。帶著這樣的現實目的來到北京，雖然自認為做了萬全準備，但他們忽略的是當時中國國內政、學界的形勢。²² 斯文·赫定在來華以前和來華以後均先與以丁文江、翁文灝為首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取得聯繫。但這時的整個國內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即原來由外國人聯絡某些單一的國內學術機關主導的國際合作局面將被打破。以北京大學為首的一些單位則希望有一個學術聯合團體代表科學界來承擔這類職能，所謂的北京學術團體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其中也明顯包含著對中國地質調查所的不滿。這並非問題的全部，在中國學術團體協會成立緣起中即明確指出，中國學術機關事權分散，勢力薄弱，遂常引起外人覬覦。並舉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瑞典人安特生、俄人伯方柯甫、美國考古隊等皆擅往各地搜掘古物，說明該會的成立是要終止所有文化優越國家的這種行為。但是從赫定內心來說，他從未將尊重在地國科學主權放在重要位置。劉復回電斯文·赫定時也說，造成今天局面的主要責任在於斯文·赫定方，因其十一月到北京後，從未想過真正與中國科學界接觸。²³ 雖然瑞典公使艾沃爾洛夫(Oscar Ewerlöf, 1876-1934) 在斯文·赫定集中精力於科學活動上的時候，不斷敦促赫定主動與中國政府及有關當局先進行談判，但是赫定仍選擇先與丁文江、顧維鈞等有私交的中國人接觸，從而導致了後來失控局面的形成。以致於斯文·赫定後來因談判時間耗時過長而失去耐心時也發出了應該早一些與有關方面取得聯繫的感嘆。²⁴

²²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p. 6-7; 王忱, 《高尚者的墓誌銘》, 頁 555。

²³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31; 斯文·赫定, 〈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誕生經過〉, 王忱, 《高尚者的墓誌銘》, 頁 580。北京學術團體與斯文·赫定方三月二十日詳談內容見〈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 王忱, 《高尚者的墓誌銘》, 頁 535-539。

²⁴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p. 52-55; 王忱, 《高尚者的墓誌銘》, 頁 604。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斯文·赫定與德國航空專家錢默滿 (Eduard Zimmermann) 上校乘火車離開柏林，經由蘇聯到達哈爾濱和瀋陽，在瀋陽拜會當時擔任北京衛戍長官的楊宇霆，²⁵ 於十一月二十日到達北京。在斯文·赫定抵達北京之前，瑞典組織考古隊的消息已經傳到北京，北京《晨報》在十一月七日刊登消息，稱瑞典方面準備組織飛行考古隊考察甘肅、新疆、蒙古等地，政府航空署正在受理，準備擇日討論。²⁶

三·斯文·赫定與中國地質調查所簽定協議的過程

在斯文·赫定與漢莎公司協商之時，就將探險計畫函告遠在中國的著名地質學家安特生 (J. G. Andersson, 1874-1960)，由安特生負責聯繫中國地質調查所翁文灝。翁未就此事擅自做主，而是去信遠在上海的淞滬商埠督辦（上海市長）丁文江徵求其意見：

斯文赫定聞將來中國，用飛艇往新疆調查，擬請調查所合作並任地質部分。弟對於合作意見：（一）地質全歸調查所；（二）史前古物適用從前協定，歷史古物則全留中國；（三）科學出版仍歸調查所；（四）如大規模測量地圖，應先得中國政府允准，並于測成後即送一份於中國政府。安君謂可以提出相商。對於此項合作辦法，兄有何意見，尚乞速為指示。²⁷

丁文江的回信現尚未查到，然而從後來的事情進展來看，丁文江對翁文灝的建議內容是同意的。斯文·赫定到達北京後，即與當時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安特生一起拜訪該所翁文灝所長。在與翁文灝協商時大體規劃了整個探險隊的合作內容。翁文灝提出這次考察活動必須有兩名中國科學家參加，並建議應向外交部提出一份書面考察計畫書，以徵得中國政府的批准。翁文灝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畢業於比利時羅文大學，一九二六年接替丁文江出任地質調查所所長。²⁸

²⁵ 袁復禮，〈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中國科技史料》3 (1983)：12。

²⁶ 〈瑞典考古隊將來華，擬由天上飛來〉，《晨報》1926.11.07，第6版。

²⁷ 李學通編，《翁文灝往來函電集 1909-1949：從地學家到民國行政院院長》（北京：團結出版社，2020），頁51。

²⁸ 楊新孝，〈中國近代地質學奠基者翁文灝博士〉，王鴻禎主編，《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233-240。

羅丰

不久，十二月七日翁文灝收到斯文·赫定和安特生的來信。赫定的信主要談及中方人員的置裝費、其他費用和薪水，中方人員將從事脊椎動物化石的發掘工作，成果的發表是重點，均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期刊上發表，並稱《中國古生物誌》尤為適宜。其中也提及所獲地質、古生物和考古採集品由中瑞雙方分享。²⁹ 安特生的函則有不同側重，並提及他與斯文·赫定協商的條件：

1. 所有無脊椎動物化石和所有人類骨骼將留在北京，前者屬於中國地質調查所陳列館，人類遺存將被保存在步達生博士籌建中的新的人類學研究所。
2. 植物化石和脊椎動物化石將按照中國地質調查所和瑞典遠東博物館依據以前採集工作相同的原則分配，即瑞典遠東博物館擁有第一標本，中國地質調查所得第二標本，且在質和量上盡可能達到所有材料的半數。
3. 中國型的歷史材料，如樓蘭的材料，將全部交給中國地質調查所。特別指出，每一篇中文文獻都將交給中國地質調查所。經中國學者挑選出的這些歷史材料的副本，晚些時候將送給瑞典。
4. 史前材料由中國地質調查所和瑞典平等分配，此條也包含那些時代較晚、非中國特徵、源於西方或西伯利亞野蠻部落的材料。³⁰

這些條款並非憑空新創，而是安特生根據自己在甘肅的考古經驗，參考了兩年前他從甘肅運回標本時的分配方案。

當時甘肅標本運抵北京後，瑞典中國委員會在安特生的授意下，向中國地質調查所發出一份公函，提出以下標本分配方案：

1. 安特生發掘的人類遺骸全部移交給中國地質調查所。其中二三個個體，在科學研究之後，贈送給我們，以便和我們眾多文物一起展示。
2. 全部的採集品的大多數將被送至瑞典做科學研究和描述。為中國地質調查所精心挑選一套採集品，應該盡可能達到有保存價值的材料的一半。動物標本其中有代表性的也將送還。
3. 促使研究工作儘快完成，以便這套材料儘快歸還，避免沒有必要的拖延。

²⁹ 斯文·赫定致翁文灝函 (1926.12.07)，李學通，《翁文灝往來函電集 1909-1949》，頁 267-268。

³⁰ 李學通，《翁文灝往來函電集 1909-1949》，頁 19-20。

4. 同意所有報告由中國地質調查所出版。但是，我們不能承擔（？）萬科朗之外的出版和印刷費用。
5. 安特生博士已經得到你們授權，每次徵得你們同意後，用瑞典文出版研究報告和簡本。
6. 根據已達成的協議，這些精心包裝的標本運至中國上海。委員會將支付運費和保險費，並事先通告歸還品和發貨時間。但委員會不再負責運抵上海後的費用。³¹

安特生對於當時北京政局瞭若指掌，知道先前甘肅標本的分配方案，在此時的政治情境下已有不宜之處，因此才在代表斯文·赫定提出條件時，較過去有些讓步。

中國地質調查所是中國當時最具影響的科學研究機構，該所的地質調查成果具有國際影響力。翁文灝在布魯塞爾國際地質大會上因成就突出，當選為國際地質學會副會長，³² 地質調查所也是為數有限與國外開展科學研究合作的機構，它的影響力實際上超出地質學領域。³³

一九二六年人類學家步達生 (Davidson Black, 1884-1934) 寫信給翁文灝，希望進行關於人類學方面的合作研究。翁文灝回信除談及人員訓練和經費問題外又特別指出：

關於人類和其他遺物的研究成果發表於《中國古生物誌》，還要明確，交給你的人類骨骼當永遠保存在中國。

當這些都獲得肯定的答覆後，一九二七年二月，雙方簽訂《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北京協和醫學院關於研究第三紀及第四紀堆積物協議書》，共有四項：

1. 從 1928 年開始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 2200 美元，作為 1929 年 12 月 31 日為止的兩年的研究專款，中國地質調查所撥 4000 元補貼這一時期費用；

³¹ 李學通，《翁文灝往來函電集 1909-1949》，頁 251-252。

³²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 61。

³³ 關於民國初年的地質學，當時包括以後的學術史都傾向於認為它是發展最早也較有成就的學科之一。參見楊翠華，〈歷史地質學在中國的發展（1912-1937）〉，頁 319-334；張九辰，《地質學與民國社會：1916-1950》（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 15-18。

羅丰

2. 步達生在雙方指定的其他專家協助下負責野外工作，二至三名受聘並隸屬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古生物學家，專門負責與本專案有關的古生物研究工作；
3. 一切標本歸中國地質調查所所有，但人類學的材料在不運出中國前提下，由北京協和醫學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
4. 一切研究成果均在《中國古生物誌》或中國地質調查所其他刊物，以及《中國地質學會》的出版物上發表。³⁴

這些條款的制定，顯示在當時中國所處之現實情境下，一位有當代國家主權意識的中國科學家能夠力爭的最大權益；無論在涉及標本歸屬或發表權、人才培養等方面，都力求以我為主、權利均等。在十月十八日的覆信中翁文灝寫道：「我對於提出的有關材料分配和人類及其他化石的研究成果都在《中國古生物誌》上發表的建議深感滿意。勿須多說根據這個建議留在您處的骨骼材料應永久保管在中國，而不論體質人類學研究機構的方案將來實現與否。」³⁵《協議書》的制定給後來「北京猿人」的發現、研究打下良好基礎，避免不必要的糾紛。

當時中國處於南北分治的狀態，北方由北洋政府控制，南方則由國民黨人掌權；各地軍閥都想用武力統一中國，³⁶ 北伐戰爭就在這背景下展開。北洋軍閥政權像走馬燈一樣輪番主政，使得北方政府常在看守狀態。據一位外國記者的觀察，政府的權力不會超過古都（北京）城牆外三十里，外交部的功能只是用來存放各國給中國的檔案。³⁷ 斯文·赫定認識到政治衝突的嚴峻性，但他似乎認為只需有足夠的耐心和外交手腕便能應付這局面。他和安特生首先拜訪外交部總長兼內閣總理顧維鈞。在聽過瑞典方的計畫後，顧維鈞對駝隊先期行動沒有表示反對，他認為飛行計畫恐怕不能獲得軍方的支持。³⁸

³⁴ 賈蘭坡，〈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王鴻禎，《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頁 57-59。較全面的文本底稿保留在步達生往來書信集中，參見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頁 28-29。

³⁵ 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頁 27, 30。

³⁶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頁 30-33。

³⁷ 哈雷特·阿班著，楊植峰譯，《民國採訪戰——《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回憶錄》（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頁 41。

³⁸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6；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55。

接著斯文·赫定在瑞駐華公使艾沃爾洛夫的陪同下拜訪航空署督辦張厚琬（字忠蓀）。雖然張厚琬對北京至迪化的空中航線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希望中國飛行員能參加首次試飛。對地面駝隊要穿越西北軍馮玉祥的地盤可能遇到的危險表示擔憂，並要求在地面探險隊結束之前，不要提及飛行計畫，以免徒增困難。³⁹ 這次接觸之後有新聞報導稱：「瑞典飛機請游歷新疆、甘肅，航空署核議，謂西北軍事未了，請外部婉拒。」⁴⁰

一九二六年的最後一天，斯文·赫定拜會外交部次長王蔭泰並獲得支持。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瑞典公使館接到外交部的答覆，大意是：由瑞典和中國科學家組成的團體欲進入甘肅、新疆二省進行考古研究。一九二七年初，第一支考察隊將借助駱駝馬匹由北京前往，沿途將研究利用飛機進行下一次探險的可能性。瑞典方面應保證不作任何違法之事，並對整個活動中可能出現的任何事故全權負責。為鼓勵進行考古考察活動，中國政府同意斯文·赫定的第一次計畫，並已指示有關地方當局，在許可權內保護並幫助斯文·赫定。署名是中國外交部。⁴¹ 接下來斯文·赫定只要將考察團人員名單送往外交部，就可以得到旅行護照。斯文·赫定的探險隊最初計畫有 15 名成員，到一九二七年二月在北京開會時，則已經有 8 名瑞典人和 11 名德國人。後者大都是高級軍官，更確切地說他們都是非常具有經驗的飛行員，並且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⁴²

斯文·赫定的考察計畫順利地獲得外交上層的全力支持，⁴³ 雙方就活動的許可範圍及條件保障進行了協商，⁴⁴ 除有斯文·赫定和安特生居中穿梭的原因以外，也與瑞典王太子古斯塔斯六世·阿道夫（Gustaf VI Adolf, 1882-1973）有關。瑞典王太子是位業餘考古學家，對田野考古具有濃厚的興趣。在安特生的熱情邀

³⁹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p. 6-7；斯文·赫定，〈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誕生經過〉，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55-556。

⁴⁰ 〈外交要訊欄〉，《申報》1926.12.07，第 4 版。

⁴¹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p. 7-8；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56。

⁴² Böhm, "Finanzierung der Zentralasienexpedition Sven Hedins," p. 46.

⁴³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18；斯文·赫定，〈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誕生經過〉，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56-557。

⁴⁴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12；斯文·赫定，〈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誕生經過〉，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61。

羅丰

請下，於一九二六年十月訪問中國，並在山西參加田野發掘。⁴⁵ 安特生鼓動王太子來華，其目的是為了支援在中國工作的田野考古學家、地質學家，向輕視田野工作的中國舊傳統挑戰。⁴⁶ 安特生的目標實現了；王太子在畢士博 (Carl W. Bishop, 1881-1942) 陪同下於十一月三日在太原北郊的新石器遺址進行發掘。⁴⁷ 接著在回國前，他在北京會晤顧維鈞，拜託後者給予斯文·赫定的考察活動官方支持。⁴⁸

他們能得到中國政府的順利批准，實際上也與安特生本人有密切關係。早在一九一四年，安特生受中國政府的聘請擔任農商部礦政司的顧問。接下來安特生在中國進行一系列的礦產調查和考古活動，發現大型鐵礦和仰韶文化，積累了相當廣泛的政學界人脈，並且利用自己的學術聲譽贏得北洋政府的信任。

這樣短的時間斯文·赫定的考察團就獲得中國政府的許可，出乎許多人的預料，尤其是在北京的西方外國人社交圈。斯文·赫定最在意英國人的態度，因為他的許多考察成果曾得到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肯定。英國人不但祝賀他的成功，甚至將佩羅拉 (Pereira) 將軍繪製的從北京至迪化的地圖借給他。《申報》也報導了外交部准許斯文·赫定前往新疆的消息。⁴⁹ 斯文·赫定同時也與其他友人們聚會商議，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參加後向法國友人報告聚會內容：

我經常告訴你在北京的這些聚會的親切性。我們有十個人，都是朋友，而且幾乎都是親密的朋友；其中包括四個中國人：丁文江、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大學教授李四光和自然歷史愛好者金先生；幾個美國人：我的偉大朋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 (Amadeus Grabau, 1870-1946) 博士，美國醫科大學的步達生博士，以及美國探險隊的古生物學家格蘭傑；兩個瑞典人：安特生

⁴⁵ Magnus Fiskesjö (馬思中) and Chen Xingcan (陳星燦), eds.,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中國之前的中國：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國史前史的發現)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4), pp. 65-66.

⁴⁶ 馬思中、陳星燦，〈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安特生致瑞典皇太子的信及其釋讀〉，《古今論衡》8 (2002)：10-17。

⁴⁷ 洪廣冀，〈畢士博、李濟與「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4 (2021)：816。

⁴⁸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5；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554。

⁴⁹ 〈外交要聞欄〉，《申報》1927.01.07，第6版。

和斯文·赫定；還有我自己。像往常一樣，聚會在友好共通的氣氛下舉行，人與人之間超越了所有國家、種族甚至是宗教的障礙，或多或少都有一種自覺的成就感。但在那個場合，由於這次會面是許多人離別的前奏，而且在一個充滿激情和仇恨的遠東氣氛中，一種淒涼的感覺籠罩著我們的談話。⁵⁰

事實上，之所以斯文·赫定探險隊計畫能得到這麼快的批覆，也與當時中國國內形勢不無關係。從一九二六年開始，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受到極大的壓力，英、日、美諸國都較大幅度的修正了對華政策。受國民革命反帝運動影響最大的英國取消對北京政府的法律承認（*de jure recognition*），而給予武漢政府事實承認（*de facto recognition*）。隨後日本也宣布政策傾向南方。美國的外交政策則以歡迎中國人民在改組其政府系統的每一進展為暗示，給北洋政府壓力並傾向南方革命政府。⁵¹ 而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凡爾賽和平公約影響，德國已失去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此時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德國相當，因此德國人在中國的一切活動須受中方制約，這反而有利於以德國隊員為主的赫定探險隊在華活動的展開。與之相對的，那些企圖進一步蠶食和瓜分中國的國家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如根據民族主義者陳友仁所言：「求生的人也不應苟活在征服者的統治下，人們應該去創造機會爭取自由，這些語言引導著人們去反對在中國的外國人。」⁵² 陳友仁曾任孫中山的外事顧問、外交部長，並主持收回漢口、九江英國租借的談判，其口吻代表了彼時中國國內普遍的聲音。斯文·赫定雖然承認民族主義情緒和仇視外國人為探險帶來了不便，但他也認為，動盪的局勢反而有助於縮短對探險隊活動的審查，甚至由於南北戰事的吃緊，對於邊境地區管轄的放鬆，也促使斯文·赫定產生了繞開馮玉祥和張作霖的部隊，經新西伯利亞至烏魯木齊，從西邊開始探險活動的想法。⁵³

⁵⁰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New York and Evanston: Harper & Row, 1962), 20 February, 1927, p. 138.

⁵¹ 參見羅志田，〈北伐前期美國政府對中國革命的認知與對策〉，《中國社會科學》1997.6，後收入氏著，《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315-324。

⁵² 意譯，參見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9；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558。

⁵³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10.

羅丰

斯文·赫定緊鑼密鼓的準備著，一面選購物資、帳篷、睡袋等野外的必需品，乳酪、黃油、通心粉、糖、鹽、咖啡、茶等生活必需品要從天津採購，氣象氣球的氫氣則要通過日本人得到；另一方面通知遠在歐洲的德國、瑞典團員儘快趕到北京，以爭取儘早出發。

此時北京政治形勢日趨緊張。北伐革命軍在南方取得勝利，奉系軍閥張作霖雖仍統治北方，但難以長久。斯文·赫定雖不看好奉系軍閥，但在一月底前仍然去拜會張作霖以尋求幫助。張作霖電告新疆督軍楊增新，介紹他前往考察，並將一封信和電報副本交給斯文·赫定，希望對考察計畫的執行有所幫助。⁵⁴ 張作霖發給楊增新的電文如下：

楊鼎帥勛鑒：頃由駐京瑞典公使介紹該國施溫·赫定博士來轅投謁。據稱，擬偕中國科學家往新、甘兩省研究考古學術，懇代電遵處，予以相當協助。除業已由外部給函並發遊歷護照外，特先電聞，並希量予保護為企。⁵⁵

電文強調其中的中國科學家。楊增新在接獲電報後，即發訓令給省府交涉署、⁵⁶ 吐魯番縣、⁵⁷ 迪化道、阿山道、塔城道、伊犁道、阿克蘇道、焉耆道、和闐道和喀什道等，⁵⁸ 請各地照章供支糧料、柴草等。

在安特生的強力推動下，安特生代表瑞典中國委員會與翁文灝代表的中國地質調查所簽訂一項協議。協議共有八條，規定了瑞典科學家在中國考察的時間和範圍，其內容主要根據之前的協議書所列並有所增加，中方人員參加則是翁文灝爭取的結果。⁵⁹ 如果單就協議條文來說，在當時中國之內外情境下，這不能說是

⁵⁴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9；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558。

⁵⁵ 〈省政府就斯文·赫定等人擬來新疆考察事給交涉署的訓令〉，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等編，《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6），頁1。

⁵⁶ 〈省政府就斯文·赫定等人擬來新疆考察事給交涉署的訓令〉，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等，《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頁1。

⁵⁷ 〈省政府就考查團進省途中諸事給吐魯番縣的訓令〉，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等，《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頁1。

⁵⁸ 〈交涉署就通報考察團入出各地日期事致各道的咨〉，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等，《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頁2。

⁵⁹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5；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563。

個不平等的協議。當時中國參與之國際合作都仍在摸索階段；如考古學家李濟自美返國後，美國史密森協會弗利爾博物館希望與其合作進行考古發掘，李濟猶豫再三後以兩個條件為前提同意：一是他們必須與中國學術團體合作；二是發掘出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⁶⁰ 前述在周口店古人類遺址發掘時，翁文灝與加拿大人類學家步達生所簽協議書上，大體也有類似的表述。

由於中國隊員的參與，考察隊被冠以「中瑞探險隊」的名義。所有歐洲隊員陸續抵達北京。除護照和持槍證外，每位考察團員配備一支步槍和一支手槍，以及數百發子彈，甚至還允許考察隊擁有 7 門小炮及炮彈。從北京到包頭的火車由政府協調安排。《申報》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的〈外交雜訊〉稱：「駐京瑞典公使函外部，請給旅行隊由天津至包頭護照，外部飭照辦。」心情不錯的斯文·赫定還去故宮遊覽參觀。⁶¹ 三月四日斯文·赫定給包頭的下屬打電話，指示他立即購買 200 匹駱駝。但此時危機已悄然而至。三月五日下午 4 時，北京大學國學門召集在京學術機構聯席會議，出手阻止斯文·赫定探險隊的探險活動。次日，《申報》記者發消息稱：（北京）「京學術團體 5 日開聯席會議，反對瑞典遠征隊考查西北地質古物，並禁以後外人隨意購買或竊掘我古物，以期長保國粹。」⁶²

四·中國科學界的覺醒與訴求

三月五日召開的聯席會議由以下機構及代表參加：古物陳列所兼中國畫學研究會代表周肇祥、中華圖書館協會袁同禮、國立京師圖書館徐鴻寶、中央觀象臺高魯、中國天文學會徐炳昶，清華學校研究院李濟及學生吳其昌、馮國瑞、張立志、朱廣福、姚名達、黃綬、宋玉嘉，地質學會兼北京圖書館代表李四光、國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袁復禮，以及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沈兼士、馬衡、劉復、黃文弼、華尚嚴。⁶³

參加會議的二十多人雖然號稱代表十二家機構，除周肇祥、高魯外，其實都與北京大學和清華學校有關。清華學校除李濟是教員，其他人都是國學研究院第

⁶⁰ 參見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1927），頁 1。

⁶¹ 〈外交雜訊〉，《申報》1927.03.01，第 5 版。

⁶² 〈外交要訊〉，《申報》1927.03.07，第 5 版；《晨報》1927.03.06，第 6 版，消息以〈京內學術團體聯合反對瑞典遠征隊，並積極研究保存古物法〉為題進行更為詳盡的報導。

⁶³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30。

羅丰

二屆的學生。⁶⁴ 徐鴻寶剛卸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袁同禮繼任，徐炳昶是北京大學教務長，李四光是北京大學地質系主任，其餘人員都是北京大學教師，可見這場活動完全由北京大學主導。代表中也有安特生的朋友李四光。

根據名為《北京學術團體反對外人採取古物之宣言》之文件，其籲求有二：其一，反對外人將在中國採集各類動植物標本及歷史文物標本運至國外，稱「凡一國內所有之特種學術材料，如歷史材料。及稀有之古生物動植礦等材料，因便利研究，尊重國權等理由皆宜由本國各學術團體自為妥實保存，以供學者之研究，絕對不允許輸出國外」。其二是，斯文·赫定考察隊的英文名稱為 *Sven Hedin Central Asia Expedition*，直譯就是「斯文·赫定中亞遠征隊」。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是隊名中直接使用 *Expedition* 一詞，有搜求、遠征的含義。這個詞彙主要應用於已經不存在的古代國家的探險活動，在一個現代主權國家使用這樣的詞彙顯然有侮辱之意。⁶⁵

北京學術界突然出手阻擋斯文·赫定考察團成行，表面看起來事前似無任何徵兆，參與學者們對此起因亦無憶往文字描述。然而此事在斯文·赫定來京不久時已露端倪；多家報紙僅以瑞典飛機考察為題進行簡短報導，其中並不涉及中方立場。而《順天時報》則不然；該報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報導稱：

北京學術界極注意瑞典飛機考古。事前並無接洽之疑慮，昨日特為慎重研究開會。

京內各學術機關，以瑞典飛機隊將來甘肅、新疆等內地考古，其範圍頗不明瞭。詢之主管機關，亦謂事前並無接洽，因此頗滋疑慮。昨日特假某處會集一次，慎重研究對付辦法，以期有裨文化，無傷國權云。⁶⁶

這報導刊在當日該報第 7 版，似乎並未引起人們關注，但其中卻有豐富訊息。

首先，瑞典飛行隊抵京即引起學術界的關注，這個所謂的北京學術界指哪些個人與機構，雖然該報導並無明言，但肯定並不包括中國地質調查所。從以後事態發展來看，應該是北京大學，很可能是以國學門為主。其次，他們曾就此事詢及主管機關，所謂的主管機關當為外交部。斯文·赫定、安特生打交道的或為外交部上層，總長顧維鈞、次長王蔭泰顯然在斯文·赫定來華之前已獲得確切資訊，已由瑞典王太子阿道夫拜託關照。但此事尚未披露，北京學術團體詢問機關

⁶⁴ 孫敦恒編著，《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頁 62-67。

⁶⁵ 〈北京學術團體反對外人採取古物之宣言昨日已發表〉，《晨報》1927.03.10，第 6 版。

⁶⁶ 〈北京學術界極注意瑞典飛機考古〉，《順天時報》1926.11.15，第 7 版。

只能是外交部內下層機構，經辦人員或不知此事，或未獲授權，只能以事先並未獲接洽答覆。最後，京內各學術機關以此為由，在十一月十四日召集各單位開會慎重研究對應策略，主題與後來的說法十分相似，「以期有裨文化，無傷國權」。北京學術團體如何得知消息其實並無直接證據，但目前可根據現有材料作一些推測。斯文·赫定經常出入於德裔美國人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教授寓所，翁文灝、丁文江及其他中國學者家中舉行的聚會，並因此結識德日進等人，⁶⁷ 出於社交原因多次參與的聚會確實為其帶來了不少好處，但也因為赫定與中國地質調查所數位中國學者的頻繁接觸，這些消息終不脛而走，從而使得聚會場合中對赫定的「同情」與「幫忙」成為了反對派的攻擊點。北京大學國學門為首的反對派這邊，反對原因之激烈、應對措施之迅速，其實也早已有跡可循。從他們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的一系列活動與主張來看，一方面這些學者對於中國境內發掘及調查所得的古物材料尤為看重，不會放任其被帶出國境，⁶⁸ 另一方面國學門組織發起高教機構集體活動也已有先例，較有經驗。⁶⁹ 因此才會在斯文·赫定一經取得中國政府許可及與中國地質調查所簽訂協議後便迅速做出反應，旗幟鮮明地反對由外國人主導的考察活動。

《順天時報》的態度耐人尋味。它是一份日本人在北京創辦的中文報紙，其報導對華事務時對中國並不友善。周作人曾對該報有過深刻指責，他指出日本對付中國的惡劣手段之一就是，利用該報之報導，觀點站在日本一方卻冠以「中國」之名。⁷⁰ 周作人說此話的時間正是一九二七年。然而僅就這條簡短報導而言，其內容頗為正面，同時亦可看出《順天時報》自有其消息管道。早年北京大學國學門的成員中許多人都曾留學日本，彼此又都是浙籍同門，易形成關係緊密的團體，後來才有留學西洋者如胡適等人的加入。⁷¹ 北京大學與當時的北洋政府

⁶⁷ 見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62-563；戴麗娟，〈中國地質學及史前學發展初期之國際性格——從德日進寄至法國的一張餐卡看起〉，《古今論衡》25 (2013)：133-166；Teilhard de Chardin,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20 February, 1927, p. 138。

⁶⁸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 (1922-1927)》（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頁 108-113。

⁶⁹ 許凱，〈北京大學對故宮博物院早期事業的貢獻 (1924-1933)——以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故宮學刊》總第 8 輯（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313-314。

⁷⁰ 周作人，〈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再是順天時報〉，氏著，《談虎集》（收入《周作人全集》〔臺中：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82〕，第 1 冊），頁 382-388。

⁷¹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頁 81；陶希聖，〈蔡先生任北大校長對近代中國發生的巨大影響〉，《傳記文學》31.2 (1977)，後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頁 45。

羅丰

關係緊張，並且在財政上受到壓抑。在校方授意下，一些留日出身的教授與日方官員組成中日學術協會活動頻繁。⁷² 國學門中與日人關係密切者甚多，《順天時報》獲得資訊的管道應頗暢通。

儘管不同的文本在表述同一事實時作者們各據其立場，但他們對事實的選擇和表述方式，相當程度地反映各當事人對事件的價值判斷。這些文本表述中的一些細節出入，反映當事者記憶差異，每個人都朝著有利於己或無損自身形象的目的來追述既往。前述《宣言》中對此考察團的指責，或許並非中方代表們的共識。依照袁復禮的理解，安特生鼓動丁文江和赫定草擬一個有損中國聲譽和主權的嚴苛協議，把前去內蒙、新疆考察所得的地質、考古材料和歷史物先送瑞典研究。其中最不能容忍的有二點：只容中國二人負與中國官廳接洽之義務，限期一年，即須東返；關於將來採集歷史之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國有相當機關再送還。「此二條為吾人最不滿意者，亦始先受反對之理由也」。⁷³ 袁復禮是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核心人員，他的說法無疑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對於丁文江甚至中國地質調查所、翁文灝的不滿是導致抵制運動之關鍵所在。

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初的西方探險家們，多少皆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的科學與進步觀的影響。對科學的信任，與對自身（其個人及其代表的國家）具先進科學知識的優越感，促使他們行走世界各地採集「科學證據與知識」。回到西方世界，他們也因其蒐集到的「科學新知」而受到政治與社會上層人士的尊重，其科學之旅也持續得到經濟與政治外交上的支持。他們因此所向披靡，將所有的探險活動正當化，甚至正義化，認為此類活動不應該受到當地政府或其他團體的制約。以探險考察之名走入全球遠離文明之區的科學家們，在科學帝國主義架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斯坦因、伯希和為代表的探險家們在中國的考察作為，多少皆帶有些科學帝國主義色彩。在當時受西方帝國主義激起的中國民族主義氛圍下，自然易引起中國學術界的警惕。「五·四」運動以後的啟蒙運動，以及民族主義思潮，讓當時中國知識界不僅注意西方列強在軍事、政治上的霸權，也開始注意其藉著政治力在文化上的侵權行為。

民族主義不是中國文化、政治的傳統，而是近現代歷史發展的產物。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與英、法等殖民主義國家交手的挫折經驗，與面對西學和西方文化入

⁷²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43。

⁷³ 袁復禮，〈蒙新五年行程紀·卷一·十六年及十七年西行紀程〉，《地學集刊》2.3/4 (1946)，後收入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247。

侵的危機感往往聯繫在一起，激化中國的民族主義。民族一體認同的產生，一個重要條件就是依賴現代傳播網路建立共同體意識。⁷⁴ 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在討論民族主義時強調與資本主義、現代印刷技術和語言的多樣性，三者重合，使得一種新形式的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⁷⁵ 清末民初各種報章迅速地由十幾種成長為幾百種，媒體變成傳播新思想的溫床和重要管道。⁷⁶ 中國知識界冀望中國能成為一個團結的民族國家以「救亡圖存」。「五·四」運動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個高峰，許多涉外事件都引起知識界的關注並造成政治衝擊。普遍的媒體傳播，又使得知識界受政治衝擊的民族主義情緒擴展到一般民眾層面。

北洋時期的職業外交家們認為辦理涉外事務時，唯一應考慮的是民族、國家利益，此外無他。⁷⁷ 雖然都高舉民族主義大旗，但中國各界對民族利益的認同頗不一致。這時的中國內政與外交不可分割，涉外事件常影響國內政局。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北上宣言》中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旗幟，促發全國輿論中的高漲民族主義情緒。⁷⁸ 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導致東南各省抵制英國人的風潮此時尚未散去，隨即演化成一場更大範圍內的普遍仇洋排外情緒。北伐前北洋政府及各地軍閥勢力相互角力，其間又各據自身利益與外國交涉，因此人們對官方涉外事宜抱有很大的懷疑，出賣國權成為人們對此一般的觀感與隱憂。在民意洪流的驅策下，人們常疑與外國合作有喪權辱國之嫌，這樣的疑慮未免失之淺隘。中國地質調查所是民國初年中國科學界少數具國際影響力的機構，與國外科學界有較豐富的往來經驗。但在一些人心目中，該所成為西方列強羽翼下的科學洋務機構，不足以代表中國科學界。

受批評的丁文江實為一位具民族認同及知曉當代國家權益的學者。如前所言，李濟在與畢士博進行合作考古前曾徵詢丁的意見，因而提出必須和中國的學

⁷⁴ 參見海斯 (Carlton J. H. Hayes)，《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231-232。

⁷⁵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頁 45。

⁷⁶ 參見張灝，〈關於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氏著，《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 166-169。

⁷⁷ 參見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第 3 卷第 1 冊，頁 379。

⁷⁸ 參見羅志田，《亂世潛流》，頁 281-285。

羅丰

術單位合作，以及發掘出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等條件。⁷⁹ 不過，丁文江在一九二七年初受到學術界的質疑、誤會是有原因的。此前一年五至十二月間，他應邀出任長江下游五省軍閥孫傳芳治下的淞滬商埠總辦，在國民黨人眼中丁文江站在北伐敵人一方；在北京學術界朋友的心目中，他支持混戰中的軍閥；對支持革命者來說，他成為替軍閥和西方列強效力的奴才，此使其良好聲譽蒙上一層陰影。⁸⁰

對於瑞典中國委員會安特生與中國地質調查所翁文灝之間達成的協議，許多人並不清楚，甚至接受道聽途說，但這些質疑並非空穴來風。即使真正瞭解內情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同仁，對此也有些不同看法；如楊鍾健所言：

簡單來說，在中國採集，一切名義上，均是中國的，費用是中瑞合股的，所採集的材料，送往瑞典分途請人鑒定研究。材料研究，發表文字一方面，由中國名義發表，材料亦以一部分歸還中國。此等辦法，看來與中國方面，不無損失，但若和以前各國在我國之調查隊相比，不免有天壤之別。且據我個人觀察，因此等辦法，所獲成績甚大，因而提倡起來我國人對於此等事業漸有興趣及努力從事的風氣，實為不少。但仔細想來，材料之大部分，淪陷於外國，研究之大部分，亦均外國人。我們不當怨人，但當責己。深望此後能更加努力，是我國科學有不如政治一樣受外人支配之一日，那麼依我個人的觀察，政治也或許有一天，可以躋身于完全獨立之林了。⁸¹

中國科學界的覺醒與一九二六年政治時局密切關聯，任何只要認為是不平等的對外合作，都會引起動盪，即使原先看來大致可行的合作模式，也不得不被重新檢視。斯文·赫定探險隊受到中國學術團體的阻擊，並非一個出乎人們意料的突發事件，而可被視為一時代轉折的表徵；西方強權國家羽翼下的科學考察活動，或全球邊緣資源探索的活動，此時已成為強弩之末，並受到中國民族主義科學家們的挑戰。袁復禮與李四光的一則小故事可表現此年代中國科學家的民族認

⁷⁹ 李濟，〈我與中國考古工作〉，《新時代》（臺北）創刊號（1961），後收入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162-163。另見洪廣冀，〈畢士博、李濟與「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頁780-787，據該文指出，其背後的動因和畢士博運作的過程，遠比呈現在檯面上的因素複雜得多。

⁸⁰ 參見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著，丁子霖等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144-165。

⁸¹ 楊鍾健，〈旅瑞典雜記〉，氏著，《去國的悲哀 西北的剖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頁93-94。

同情感。他們一同參加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考察團成果發布會，當時美國人宣稱：「我們在內蒙找到巨大恐龍化石，打著莊嚴的美國國旗，唱著美國國歌，勝利前進，我們要走在世界的前面。」聽完這樣的演講，李四光非常氣憤地對袁復禮說：「聽見了吧，美國人太傲慢了！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作為，要不然，咱們中國人就沒有法在外國人面前直起腰來。」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最後臨行前，李四光又向袁復禮提及此事。⁸² 李濟對國外學界人士也有類似的不滿。⁸³

五・中方與斯文・赫定多回合談判

以「中國學術團體」亦稱「聯合會」為名發表的共同宣言，針對的並不僅僅是斯文・赫定，也將以丁文江、翁文灝為首的中國地質調查所推向對立面。三月九日丁文江從上海回到北京，寫了一封由赫定署名措辭委婉、謙恭致沈兼士的信：信中對北京各學術團體開會反對的新疆之行做出解釋，絕無攫取中國歷史資料與藝術遺物之意；稱曾向中國政府自動提出此行所獲歷史遺物全數留存中國，聲明願與任何學術機關或團體共同磋商處置此項資料之辦法；並盼能選擇一考古或歷史方面有經驗之人同行，將來此行所獲中國歷史與藝術之遺物即由此人全部攜回北京，並願負擔來人一切費用。⁸⁴ 依照斯文・赫定的說法，這封丁文江口述的信並沒有被發出，但報紙上卻刊載了。⁸⁵

斯文・赫定和其贊助者評估局勢，其結論就是只有與反對者進行面對面的談判，才能使不利的局面有所改觀。如果無視反對者的宣言，眾多抗議的學生們一定攻擊考察隊，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斯文・赫定覺得其中一些謠言應該澄清，丁文江則認為對方主要針對他和翁文灝、中國地質調查所，反對他們未和其他機構

⁸² 參見馬勝雲，〈袁復禮和李四光的友誼〉，發表於中國地質大學主辦，「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第16屆學術研討會」（北京：中國地質大學，2003.06）。

⁸³ 李濟在給傅斯年的信中稱：「安陽發掘完全是因為一時心血來潮，想啃硬骨頭，同外國人作事不能不如此割割腳。他們面子上雖說很客氣，心裡總以老前輩自居。對於我們這種窮小子只是提攜獎勵而已，而自己以為站在無所不容的地位。」「也許我們的兒子（應該說我的）可以替我們出這口氣，希望總要有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元 25-10，1929.01.23 李濟致傅孟真函。

⁸⁴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533；〈赫定聲明赴新疆所獲遺物盡贈（贈）中國〉，《益世報》1927.03.13，第6版。

⁸⁵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18；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567。

協商就與外國簽約。外交部等政府當局則支持斯文·赫定繼續其考察行動，並認為這並不是學界反對外國探險活動，而是反政府之學生運動的一部分。為了表示支持此探險活動，政府當局積極為探險隊準備火車。⁸⁶ 而斯文·赫定則仍努力於和學術團體談判，以挽救此危機。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對於阻止斯文·赫定探險活動有一段解釋：

我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古跡以及其他之特種學術材料蘊藏極為豐富。只以學術機關，事權分散，勢力薄弱，不能充量採集發掘，加以研究。遂常引外人覬覦，如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瑞典人安特生、俄人伯芳柯甫、美國考古隊，皆善（擅）往各地發掘古物，如甘肅、新疆之經卷、壁畫、陶器，蒙古之化石，莫不大宗捆載以去，實堪痛惜。⁸⁷

敦煌文書的發現給文化自覺意識強烈的學術領袖強烈刺激，他們不能坐視與自身歷史文化密切關聯的古代文物流失國外。當然這些文化領袖主要關注點尚在自身熟悉的古代文物領域，礦物、植物、動物的內容較少進入其視野。

三月十日式文·赫定與安特生拜會了北京大學國學門，據斯文·赫定稱是應北京大學國學門邀請前往。短暫會面之後，斯文·赫定希望代表們能前往他居住的北京飯店赴宴。可是後來的新聞報導稱：「赫定昨日宴請各學術團體代表，各代表以此舉極為無聊，均托故未去。」⁸⁸《順天時報》則在三月十三日以〈瑞典遠征隊取道京綏，將赴甘新兩省〉為題，⁸⁹ 報導外交部次長致函交通部的消息。其實這只是按先前計畫準備車輛，但報導卻以「取道京綏」引人注目，意思是北京學術團體已公開反對，但政府仍在為探險隊積極準備車輛，明顯無視反對聲浪。在諸多報紙中《順天時報》首先刊登北京學術團體宣言的全文，並稱：「昨據該會來函，謂日前所發表尚非全貌，茲特將其原文，照錄于左。」⁹⁰ 學術團體

⁸⁶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p. 17-21；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66-570。「政府為瑞典遠征隊備專車。北京各學術團體聯合發表宣言反對瑞典遠征隊，已志昨報。茲聞瑞典公使前日為遠征隊致函外部，請為該隊特備專車。外部即轉行通知交部，交部當局亦轉飭京奉路局查照。外交部昨接到交通部函稱：瑞典考古隊請備車輛一事已飭京奉鐵路籌畫，一俟該隊到站時，即備車輛運送至京，至由京至綏，仍希詢明其何日啟行見復。再行核辦云云。」《晨報》1927.03.11，第 6 版。

⁸⁷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緣起〉，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29。

⁸⁸ 〈北京學術團體繼續反對瑞典遠征隊〉，《益世報》1927.03.15，第 7 版；〈各學術團體積極反對瑞典遠征隊〉，《晨報》1927.03.15，第 6 版。

⁸⁹ 〈瑞典遠征隊取道京綏，將赴甘新兩省〉，《順天時報》1927.03.13，第 7 版。

⁹⁰ 〈學團聯合會反對瑞典考古遠征，督促政府嚴加禁止〉，《順天時報》1927.03.12，第 7 版。

專門函告《順天時報》，表明二者或有良好的互動。新聞界是反對此案之學術團體的堅定支持者，斯文·赫定溝通活動失敗迅速見報。談判氣氛又趨於緊張，北京學術團體稱：赫定所擬辦法「惜與原則第一項由中國人主辦之說相背」，⁹¹ 故婉辭謝絕。

斯文·赫定頻繁穿梭政、學界之間，他的目標只有一個，無論如何也要促使考察活動成功進行，在此前提下可妥協與調整細節。斯文·赫定去信對遠征隊一名稱進行解釋：說反對的理由實乃出於對 Expedition 一詞的誤會。據他所知「科學遠征隊」乃科學家有組織的團體，有帳幕、駱駝、糧食等給養方能遠征荒野如蒙古、新疆之沙漠地帶就是最好的例證。「科學遠征隊」一名滋生誤解，實在抱歉。總之，此命名實無侵害之意，如有誤會則願意放棄這樣的命名。⁹² 雖然有這樣的解釋但 Expedition 並不一定都是指對古代文明的考察，更多地相當於對蠻荒之地的探險，甚至連中文中的探險、考察這兩個中文詞彙都有類似的含義。所以最後達成協議中所採用的「考查團」一名，或許是有意避開「探險」、「考察」這類的詞彙。⁹³

三月二十日斯文·赫定和安特生應邀來到六國飯店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代表周肇祥、劉復、袁復禮、李濟進行協商。周肇祥主談，袁復禮記錄；中方備忘錄記錄雙方詳盡對話，其中片段：

赫定：此行主要目的在考察地理氣象天文及地磁學，對於考古及地質學是附帶目的，如有人反對，此二項可以取消。

周肇祥：我們反對不只此一二項，是整個的反對。不專為某一事。以前我們只知道你們去考古以及地質，並不知道有其他目的。

周肇祥專門詢及氣象與軍事的關係及人員構成，赫定堅稱與軍事無關，袁復禮則說以前美國曾有人欲到加拿大去研究氣象，加拿大政府就拒絕了。

周肇祥：管天文、氣象的是哪國人？

赫定：是德國人。關於氣象的人，也是德國人。

周肇祥：是學者或是軍人？

⁹¹ 〈各學術團體積極反對瑞典遠征隊〉，《晨報》1927.03.15，第6版。

⁹² 參見〈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534。

⁹³ 按照賀昌群的意見，Expedition 翻譯為「探檢」，在他看來很多地方已無險可探，所以「探檢」比「探險」更合適。參見王新春，〈西北科學考查團與近代中國考古之興起〉，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7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340。

羅丰

赫定：全是在大學有過訓練的，但德國是行徵兵制的國家，所以他們全曾在戰場上生活過的，他們年紀最小的二十餘歲，大的四十多歲。

周肇祥：這些德國人是自願與你們合作呢？還是你僱傭的呢？⁹⁴

周肇祥最後一問道出了問題的關鍵。於是赫定說：「因為瑞典人不足用；所以請有訓練的德國人，但薪水是很少的，在瑞典訓練一個人要用半年光陰，所以僱傭有訓練的德國人。」⁹⁵

面對中方代表的詰問，斯文·赫定有些閃爍其詞，有關氣象與軍事的關係中方的詢問顯然有針對性，斯文·赫定只能顧左右而言他。斯文·赫定刻意隱瞞德國現役軍人和德國人主導的內容。在以後的回憶中，斯文·赫定這樣評價中方代表：「對方表現的倒是很客氣和和藹，同時，他們語言邏輯上的鋒利及其透入的深度又令人震驚。」⁹⁶ 另外，在參加隊員是德國軍人和整個費用出資方資訊，顯然斯文·赫定隱瞞其中的內容，後者在與漢莎航空公司協商時已被列為不可暴露的絕密。漢斯·玻姆通過歷史檔案研究揭示瑞方漢莎航空公司經費秘密資助德國政府搜集軍事情報，中國學者的抗議與干預挫敗了德方的這個行徑。⁹⁷ 本來安特生就對考察團中諸多德國人表示懷疑，在給斯文·赫定的一封信中表達了他的意見：

在十二月裡，您想讓艾沃爾洛夫大臣和我理解，很多德國工作人員都是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飛行專家。（略）僅僅在德國人到達這裡時，我們才明白，所有德國人中只有一個是受過科學教育的人。（略）在這種情況下，請允許我提醒您，一方面我本人以最友好的態度對待每個可愛的令人愉快的德國人，一方面我不是在意那麼多的德國人，而是在意其中只有一位科學家。

安特生認為關於飛行計畫的秘密性和德國人的參與都是錯誤的。⁹⁸ 中方當然在許多問題上點到為止，並沒有進一步追問。

中方代表的參與人員中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堅決主張阻止與外國的全部合作活動，並且人數眾多；第二類則是理性看待中外科學合作，在一個科學

⁹⁴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36-537。

⁹⁵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37。

⁹⁶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28；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77。

⁹⁷ Böhm, "Finanzierung der Zentralasienexpedition Sven Hedins," pp. 40-54.

⁹⁸ 安特生致斯文·赫定的信，轉引自楊·魯姆嘉德著，萬之譯，《從極地到中國——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傳》（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頁 164。

不發達的中國，經濟瀕於崩潰邊緣，依賴與國外合作培養人才是唯一可行之路。後者以李濟、袁復禮為代表，他們除有在西方學習背景外，或多或少都有與外國科學家合作的經歷。中方的主談人是周肇祥，是一位資深的退役官員，曾任湖南布政使，也是書畫家和古物研究家。據斯文·赫定觀察，他表面客氣神態安詳，像紳士一樣，但內心深處充滿著對外國人不可調和的仇恨。⁹⁹ 代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是劉復，以及北京大學國學門主任沈兼士。非常不巧，三、四月分談判的關鍵時刻，沈兼士與馬衡去日本東京參加東亞考古學成立大會。¹⁰⁰

向斯文·赫定詢問十四點問題之後，中方要求他進行書面答覆，且要在規模更大的會議上進行討論。三月二十二日斯文·赫定決定讓探險隊大部分成員乘坐火車離開北京前往包頭。值得注意的是《順天時報》在探險隊成員赴綏遠的當天就刊載這則消息。¹⁰¹ 斯文·赫定的舉措引起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強烈不滿，劉復寫了一措辭強烈的信給斯文·赫定，責其出爾反爾，並稱若其離開北京一切將無從挽回。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受到壓力，準備撤回已頒發的護照。同時電告綏遠、新疆、甘肅省政府，敦促他們阻止探險隊的行動，因為侵犯了中國主權，¹⁰² 甚至有人稱探險隊有宣揚共產主義嫌疑。¹⁰³ 後來談判繼續進行。中方的主張共有十五項。首先探險隊要改換名稱：中國科學團體聯合會下屬赴新疆代表團。

在聽了劉復讀完中方十五條意見後，斯文·赫定冷冷地說：「這是一份要強加於我的《凡爾賽條約》。」經過兩個半小時你來我往的商討，老練的斯文·赫定漸摸清中方的底牌。他認為中國人會在中國隊員數目上做出讓步，而不願白白失去加入此由外國人出資而又裝備先進的大型探險隊的機會。斯文·赫定表示能接受十五條中的八條。翁文灝則勸他全部接受這些條件，並稱此協議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禮儀性的，不會帶來任何麻煩。對於中方雇員的報酬，翁也勸他不妨大方一點。¹⁰⁴

⁹⁹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25；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574。

¹⁰⁰ 〈東方考古學協會公開講演會〉，《史學雜誌》38.6 (1927)：607。

¹⁰¹ 部分探險隊員離京赴包頭的消息由《順天時報》首先披露，見〈瑞典考古隊已首途赴新〉，《順天時報》1927.03.22，第7版。

¹⁰² 〈各學術團體反對瑞典遠征隊，電綏新甘當局阻止前往〉，《晨報》1927.03.24，第6版。

¹⁰³ 〈本館專電欄〉，《申報》1927.03.27，第6版稱：「北京瑞典考古隊赫定等，行抵綏遠附近，被當地軍事機關扣留，謂其有宣傳某主義嫌疑，現已電京辦理。」

¹⁰⁴ 參見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p. 36-38；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586-588。

羅丰

看來勢頭是向好的方向發展，但是多變的政治局勢給本來就已經風聲鶴唳的西方交際圈帶來不確定因素。當統一成為共識時，人力物力財力處於劣勢的國民革命軍戰勝北洋軍閥，使人們頗感意外。¹⁰⁵ 此時德國公使電告柏林，聲稱他已無法保證探險隊在華人員的安全，希望能撤回。¹⁰⁶ 張作霖突擊蘇聯駐華大使館，抓走共產黨人領袖李大釗的事件也在四月六日發生。¹⁰⁷ 北伐的國民黨人快打過來了，斯文·赫定只能加速談判進程，爭取早日成行，同時拜訪奉系軍閥的核心人物楊宇霆總參議，爭取軍方支持。顧維鈞親自找學術團體成員，要求他們拿出一個友好的解決方案。¹⁰⁸

新一輪談判開始時，斯文·赫定首先開出的條件是，探險隊只能安排 4 名科學家和 5 名學生，科學家每人每月 150 美元，學生每人每月 50 美元。中方的原有條件則是 5 名科學家和 10 名學生，雙方已經非常接近了。最重要的則是在調查或者發掘後的文物副品問題。斯文·赫定告訴中方代表：「如果有許多重要考古發現，貴方將獲得其中大部分，我們只要求雙份其中之一。中國的古老藝術也將為更多歐洲人所知，實際上是替中國作宣傳。」中方提出的問題是，重複古物很難定義，很難分得合理。斯文·赫定接著問，如果是兩個一模一樣的古墓呢？「那好，其中一個歸你」，這是一個重大讓步。斯文·赫定希望就此條款簽訂一個不公開的協議，中方也同意以書面形式回答這一問題。¹⁰⁹ 但是在四月十四日的會議上討論這一議題時，對瑞典方面是否可以得到副本進行表決；在場的十二名成員有十人贊成瑞方接受副本，但不以書面形式正式承諾。這樣斯文·赫定始終沒能得到中方的書面答覆。為此，斯文·赫定專門致信聯合會要求解釋，直到協議簽字後的四月二十八日，劉復禮信稱：「鑒於您的提議中包含有悖於已簽署之協定條款的意願，聯合會深表遺憾，可惜本會已不具備對此事給予應有考慮的條件。」¹¹⁰

談判雖朝有利雙方的方向邁進，但時間延宕使斯文·赫定感到不安，也給中

¹⁰⁵ 參見羅志田，《亂世潛流》，頁 185-216。

¹⁰⁶ 參見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42；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92-593。

¹⁰⁷ 參見李書華，《七年北大》，陳平原、夏曉虹，《北大舊事》，頁 103-104。

¹⁰⁸ 參見楊·魯姆嘉德，《從極地到中國》，頁 170。

¹⁰⁹ 參見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41；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91。

¹¹⁰ 楊·魯姆嘉德，《從極地到中國》，頁 171。

方代表帶來壓力。向新聞界放話也是中方舒緩解套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晨報》稱：「瑞典遠征隊又運來大批儀器，學術團體反對尚無效力。」¹¹¹文中對探險隊使用的各類器械、儀器，經稅務處飭海關納稅放行一事進行披露，給中方的強硬立場增加底氣。《益世報》稱：「瑞典赫定博士所帶之考古隊一行，刻已啟程赴新，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處，以近據新、晉、察各省區長官來電，均以該考古隊係另有圖謀，請予阻止。」¹¹²這是北京學術團體致電地方政府之後，各地方當局的回電給北京軍方施加壓力。《順天時報》竟在雙方大體達成協議時，以〈北京五機關組織考古隊，考察地點為內蒙新疆〉刊發新聞稿，其內容亦為中瑞雙方協議之考查團人數，但隻字未提斯文·赫定或瑞方。¹¹³《順天時報》疑慮西歐勢力進入中國，因而此報導故意略去西洋人在其中的角色，令人誤以為中方學術單位要另行組隊進行內蒙、新疆考察，似有挑撥之嫌。¹¹⁴

¹¹¹ 〈瑞典遠征隊又運來大批儀器，學術團體反對尚無效力〉，《晨報》1927.04.03，第6版。

¹¹² 〈瑞典考古隊另有圖謀，新晉等省來電阻止前往〉，《益世報》1927.04.03，第6版。但這樣的消息恐怕不甚準確，新疆省政府稱：「本年四月八日接准外交部快郵電開：瑞典遊歷考察隊由京乘火車至綏遠，換用駝、馬前往甘、新等處考察一事，業於一月五日電達，接洽在案。現該隊領袖海德仁即施溫·赫定約於本月十四、五日，率隊員攜帶駝、馬、器械、行裝暨一切日用品由京出發，希飭屬於該隊到境時妥為保護，並免一切稅項，以示優待。特電查照。」外交部的這一電令由新疆省政府轉發並飭所屬局長一體遵照（〈省政府就考察團已由北平出發事給交涉署的訓令〉，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等，《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頁3）。並無阻止考察團入新疆之事。

¹¹³ 《順天時報》1927.04.23，第7版稱：「北大、歷史博物館、地質調查所、中央觀象台、故宮博物院五機關，以西北一帶古蹟甚多、氣候亦異，殊有研究學理之價值，特組織一西北科學考察團，向內蒙新疆等處，實力（地）考察，團員共為十人。」

¹¹⁴ 周作人認為，「日本漢文報是日本侵略擾亂中國之最惡辣的一種手段，順天時報則是此類漢文報中最惡辣的一種」，「報上聲聲口口很親熱地叫『吾國』，而其觀點則完全是日本人的」，並說「日本漢文報之胡鬧是有目共見的事實」。參見周作人，〈日本浪人與順天時報〉、〈再是順天時報〉，氏著，《談虎集》，頁382-388。關於考察團的新聞報導，《黃報》與《益世報》不但言明了考察活動會有西洋人參與，同時探險隊對新疆地方政府會很有幫助，其目的完全出於公正和忠誠，赫定認為這顯然可作為與中國人親密合作的最充分的一條證據（參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44；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594-595）。以上報導與《順天時報》的論調截然不同，此外，三月二十一日《順天時報》突載瑞典考古隊業已出發之消息，並謂赫定博士令中國僕人二名已攜帶物品先行出發，此事斯文·赫定已作解釋，證明是《順天時報》報導失實，再次說明了該報紙報導有失偏頗。綜合來看，雖然無直接證據言明《順天時報》的真實意圖，但是其做法顯然有違新聞報導的真實性，大有挑撥之意圖，因而此處結論是基於若干事實的一種合理性推測。

羅丰

對於談判中的一些細節，斯文·赫定洞悉其中奧妙。如整個考察活動中一重要內容是考古，但斯文·赫定本人並非考古學家，因而他以拋棄考古調查為誘餌，迫使中方不但同意考古調查，甚至同意了考古發掘。¹¹⁵ 總之，一切按照翁文灝推演的劇本進行，斯文·赫定也探得中方底線，雙方終達成協議。原則問題敲定以後，又有兩次細節推敲，例如中瑞雙團長制，理事會的領導權等，更細小的文字表述都有你來我往的口舌之戰。不過，斯文·赫定內心十分清楚，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不會有實際影響。他非常篤定地認為只要探險隊出發，一定會按照他的意志行事。根據德日進的觀察：「斯文·赫定要啟程了，雖然加進了許多中方團員，但這些看來一點也不對他造成困擾。」¹¹⁶ 細心的研究者從德日進寄給他遠在法國巴黎的老師步勒 (Marcellin Boule, 1861-1942) 的一張法文餐牌談起，來構畫出當時中國地質學界與外國科學家的合作關係。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北京大學雙方進行最後磋商，集中在第十三條，修改後確定如果不影響探險隊的活動，也可進行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斯文·赫定覺得修改後的內容對他們更加有利。協議最後由周肇祥與斯文·赫定共同簽署。

六·中瑞簽成協議或是雙贏

中瑞雙方達成協議的消息傳播很快，各大報刊相繼刊載了協議條款的全文，《晨報》、《申報》、《益世報》、《大公報》和《順天時報》等基本上都在顯著的位置刊載了協議的全部內容。

探險隊的名稱已變更為「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中方團長由北京大學教授徐炳昶擔任。但據斯文·赫定的說法在西方世界考查團被冠名「中瑞探險隊」。名為《中瑞共同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合作辦法》的協議，共有十九條，其中第十至十四條為：

第十條 凡直接或間接對於中國國防、國權上有關係之事物，一概不得考查。如有違反者，應責成中國團長隨時制止。

¹¹⁵ 〈中國學術團體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42-545。

¹¹⁶ 戴麗娟，〈中國地質學及史前學發展初期之國際性格〉，頁 143-144。賈蘭坡在回憶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成立的文章中也使用了這張餐牌，只是日期上誤為四月二十日，參見氏著，〈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頁 60-61。

第十一條 旅行時所繪地圖。除工作所用區域外，其比例不得大於三十萬分之一。

第十二條 考查時應守之規定如下：

(一) 不得有任何藉口致毀損關於歷史、美術等之建築物。

(二) 不得私人名義購買古物。

第十三條 關於考古學，規定不作發掘的工作，但遇有小規模之發掘，對於全團之進行，並無大礙。又採掘所得之物不甚滯，運輸上無須有特別設備者，得由中國團長商同外國團長執行云。(但對於全團行進並無妨礙時，較大規模之考古學的發掘仍可為之)

第十四條 收羅或採掘所得之物件。其處分方法規定如下：

(一) 關於考古學者。統須交與中國團長或所委託之中國團員運歸本會保存。

(二) 關於地質學者。其辦法同上。但將來運回北京之後。經理事會之審查。得以副本一份贈與斯文赫定博士。¹¹⁷

不過，報刊所刊或有誤，如第十九條「本定辦法，附有英文譯本一分（份），應以中文為主」。¹¹⁸《申報》、《東方雜誌》、《教育雜誌》都刊載為「應以英文為主」。¹¹⁹《辦法》中還規定了中西文考察報告的出版方法。

這份協議，由其長遠的歷史意義來說，它反映一個國外探險家得以在中國各地任意行其探索、搜羅文物並攜返其國的時代之結束。正如中方代表所期望，以後任何歐洲探險家要求在中國活動時，這份協議將作為前例，約束來者。在後來的美國安德思 (R. C. Andrews, 1884-1960) 探險隊重新進入中國考察時，古物保管委員會就援引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協議加以阻止。與斯文·赫定的談判也催生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正式誕生。教育部批准其成立指出：「其章程專為採集、保存我國學術材料，以應時事之需要，自居而行，應准予立案。」¹²⁰ 其中對於外國人在華進行的科學調查活動多有約束，與《中瑞共同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合作辦法》內容多有重合之處。

¹¹⁷ 〈西北考查科學團八日出發〉，《大公報》1927.05.04，第3版；〈西北考查科學團八日出發（續）〉，《大公報》1927.05.05，第3版。

¹¹⁸ 〈西北考察科學團定期出發〉，《益世報》1927.05.05，第7版。

¹¹⁹ 〈中瑞合組西北科學考查團（續）〉，《申報》1927.05.11，第7版；斯文·赫定、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協定〉，《東方雜誌》24.8 (1927)：103-105；〈教育界消息：西北科學考查團之成立與出發〉，《教育雜誌》19.6 (1927)：2。

¹²⁰ 〈教育部批示批字第159號〉，《政府公報》（北京）234 (1927)：115-116。

協議只是一些條文，如何實施或落實其內容或許更為關鍵。中方顯然要有一個地位相等的人擔任中方團長，以便處理考察過程中遇到的各類問題。事實證明，徐炳昶是位稱職、合適的中方團長。按照斯文·赫定的說法，探險隊出發不久，徐炳昶就坦誠相告，他缺乏率領一支大駝隊穿越沙漠地區的經驗，斯文·赫定可以全權負責，¹²¹ 兩位團長關係非常融洽。斯文·赫定在後來出版的《亞洲探險八年》中逐條分析了關於協議的評論和說明。尤其是未能執行協議內容部分進行詳細的說明。協議的第七條中規定考察路線只是粗線條的，這條路線的選擇並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安特生向斯文·赫定建議規劃了這條路線，道路途經地區其實是政治、行政的敏感地帶。在斯文·赫定的旅行記中不斷出現沿著這條道路往來的駝隊，長長的駝隊馱著許多物資沿蒙古草原的邊緣行進，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河西走廊。他們會在這裡補充物資、糧食和淡水，其他道路或許不能滿足這些條件。

斯文·赫定覺得探險隊中準備的學科不夠齊全，根本沒有提到動物學、植物學，中國學者對民族學也沒什麼興趣。實際上這些都與中國科學界的現狀有關，當時的許多學科正在起步階段，除地質學由於地質調查所的關係稍有起色外，協議中討論較多的考古，除李濟外基本沒有合格的考古學家。大家對考古學認識相當不一，北京大學考古科的負責人馬衡，竟然想要使得「地下的二十四史取地上的二十四史而代之」。¹²² 即是以考古學者名義加入考察團的黃文弼，此時只是國學門的一名助教，雖然對考古學抱有濃厚興趣，但實未曾受正式考古學訓練。¹²³

斯文·赫定稱，好笑的是協議簽署時，中方有兩人打聽考察沿途是否有旅店可以居住，當聽說包頭至哈密之間連一間房都沒有，他們很失望。¹²⁴ 徐炳昶在斯文·赫定《長征記》的〈敘言〉中講述了這樣一則故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天氣已經冷了，結冰了。這位勇敢的劉（衍淮）君告訴我說，他不想再做

¹²¹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55; 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605。

¹²² 馬衡，〈考古與迷信〉，《晨報副鐫》1925.12.24，後收入《馬衡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頁321-325。

¹²³ 朱玉麒，〈北京大學時期的黃文弼〉，榮新江、朱玉麒主編，《西域考古·史地·語言研究新視野——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頁169-170。

¹²⁴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50; 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602。

路線圖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天氣太冷了。我當時覺得他的理由不充足，因為那時不過剛結冰，但是做路線圖，並不是他職務內本有的工作，所以我也不大好勉強。到晚晌吃飯的時候，他同樣的告訴赫定先生，赫定先生聽說他怕冷，一言不發，一場大笑！」¹²⁵ 可見中方團員無論從心智到體力都沒有準備好參加一場曠日持久的田野探險考察活動。

第十一條中，不允許考察中繪製超過三十萬之一大比例尺地圖。實際上此條文幾近荒謬。當時中國人根本沒有可用的地圖，能拿出的是清代所繪的地圖。因為三十萬分之一以下的地圖具有軍事地圖的功能，所以被禁止繪製。丁文江第一次在中國進行地質調查時發現「武昌興圖學會」的地圖、商務印書館的《最新中國地圖》，以及英、德、法、日出版的一百萬分之一的地圖，都仍是根據清康熙年間，天主教傳教士所測的地圖作藍本。¹²⁶ 僅過幾年時間，當無任何改善，而小比例尺的地圖對於這樣的專業考察毫無幫助。另外諸條如將日記、筆記、草圖、照片等上交理事會審查形同虛設，中、英文報告書的出版俱無可執行之條件。

當時歐洲科學界最看重探險家的各類報告和探險日記的發表，探險類書籍是知識界追捧的對象；這是斯文·赫定最在意的事，中方代表們則不介意。這類書籍不但能滿足人們對東方世界的好奇心，也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報刊要連載，出版商會出版，探險家也會找到下次探險的贊助商。當時來中國工作的外國學者，都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幾乎每次重要發現都會在最短的時間內讓世人知道。¹²⁷

斯文·赫定最關心的問題卻根本沒有在這十九條之中，就是「有關發表一本通俗的旅行指南讀物」。雖然斯文·赫定用通俗的旅行指南讀物來替代他每次探險活動之後的探險紀實，弱化其中風險。翁文灝告訴他這很好辦，根本不用理會。赫定還是擔心的問道：「假如我不經委員會同意就寫了類似的書，難道他們（不）會很憤怒嗎？」翁文灝安慰道：「我想不會。只要你願意，對這一點你可

¹²⁵ 徐炳昶，〈敘言〉，斯文·赫定，《長征記》，頁2。

¹²⁶ 胡適，《丁文江傳》（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頁21。

¹²⁷ 例如法國學者德日進在每次調查發掘之後都要迅速發表，這些文章從一、二頁到數十頁不等，內容深淺不一，但重點不是向學界提供完整的成果，而是在發表時間上搶得先機。參見戴麗娟，〈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113-114。

以保留你的權利。」¹²⁸ 斯文·赫定非常看重他的名字與西北科學考查團的關係，直到一九四五年在去函翁文灝請求資助英文中亞地圖集出版時特別強調：「地圖集使用英文，我的名字應該與地圖集的標題相關聯。」¹²⁹

斯文·赫定本人強烈地渴望成為發現某物的第一人，他也靠這一聲望維持生計。斯文·赫定的種種發現是他得到「贊助者」支持的依據，他們銷售斯文·赫定的著作，聆聽他的報告。他的目標主要是發現未知的地域並繪製地圖，解決地理專業問題，他對收集文物的興趣並不強烈。事實上他的收集品，在後來研究者看來只是一些沒有科學意義的東西，更像是探險經歷的紀念物。¹³⁰

斯文·赫定不但是一名影響甚大的探險家，也是一名暢銷書作家，優美的文筆、驚奇的經歷，讓他擁有眾多讀者。斯文·赫定在剛成為探險家時，就成功地為自己的書找到很好的出版商。在受僱於萊比錫佈羅克豪斯 (Brockhaus) 公司後，就成為德國出版界具有轟動性的人物。他的那些書以長篇、中篇、短篇的不同版本發行，並大量再版。就書的出版而言，斯文·赫定與另一位著名探險家斯坦因之間有著競爭關係。¹³¹ 他的著作被翻譯成英、法、俄、日等多種語言，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他的探險活動就是為了讓世人盡知。他的發表策略是，首先儘快將途中經歷迅速在各種報刊上發表。然後，將地圖與手繪圖加入旅行記出版，成為暢銷書，最後再進一步出版卷帙浩繁的科學考察報告。與此同時也將完整的探險記縮寫成一本簡潔明快、適合青少年的讀物，實際上這也是為面對大部頭著作而卻步的讀者所寫。¹³² 通過這一系列有效的寫作運作，給斯文·赫定帶來非常可觀的收入，所以他特別注重探險經歷的獨一性，這些卻並不被中方代表所理解。斯文·赫定作為資深的探險家諳熟此道。後來西北科學考查團最終以《斯文·赫定博士領導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集》(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¹²⁸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38; 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588。

¹²⁹ 斯文·赫定致翁文灝函 (1945.09.29), 李學通,《翁文灝往來函電集 1909-1949》,頁201。

¹³⁰ 霍根·沃爾斯特著,李佩娟譯,〈斯文·赫定的民族學收藏品〉,馬大正等主編,《西域考察與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頁105。

¹³¹ 丹尼爾 C·沃,〈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通往一個概念的考古學〉,朱玉麒,《西域文史》第7輯,頁306及註23。

¹³² 伍賀庚 (Håkan Wahlquist) 為斯文·赫定《從南極到北極》所寫序言,斯文·赫定著,王瑞譯,《從南極到北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頁2。

Expeditio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名義出版。¹³³ 斯文·赫定原本打算將一些中國學者所寫的考察報告納入其中，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儘管有這些遺憾，這部涵蓋地理、測量、地質、植物、動物、考古、民族、氣象等諸多學科的著作，只能用令世人震驚來形容。

隨著歲月的流逝，一些當時非常重要的問題如經費，後來已經無足輕重。西北科學考查團當年使用的經費是一個天文數字，光買駱駝一項就花去了 3,400 元，在徐炳昶看來以他自己的能力要籌措三五萬元是絕無可能。¹³⁴ 付給團員及學生的薪資也是一筆重要的開支，翁文灝勸斯文·赫定在這些事上不妨大方一些，以贏獲人心。雖然這些花費總體計算起來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斯文·赫定覺得類似的支出是非常必要的，受益人對探險隊來說有著巨大的價值，是考察順利進行的必要保證。

從一九二五年開始北洋政府陷入財政危機，北京大學及其他國立大學的教員，一直不能按時領到薪水。他們常常兩、三個月才會領到半個月的薪俸。所有的罷課行動要求北洋政府發放欠薪成為常態，學生、教員和工人聯合起來罷工、罷課，差不多每個月都發生，不是罷課，就是罷工。¹³⁵ 當時教授薪俸標準在 400-500 元間，副教授 280-340 元，講師 200-260 元，助教是 100-180 元。¹³⁶ 據魯迅〈記「發薪」〉稱，北洋政府積欠他薪俸二年半，共計 9,240 銀元。¹³⁷ 斯文·赫定付給學生每人 50 元，黃文弼津貼 80 元，詹蕃勳 200 元，每月共計 850 元。徐炳昶、袁復禮則不受津貼。¹³⁸ 中方全部人員所需費用，以兩年為計共需 3 萬元，理事會通過決議以募捐為主，絕不接受外人津貼。原來的預算是學者每人每月 200 元；學生每人每月 50 元，每月共需 1,200 元。至出發前收到捐款，交通部路政司 1,000 元，葉恭綽 500 元，周肇祥 200 元，歷史博物館館長徐協貞 150 元，其他各機關 50 或 100 元，共計 2,000 餘元，交由團長徐炳昶帶往路途使用。¹³⁹ 比起

¹³³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 XIII. 一九四三年斯文·赫定就規劃出版整個文集計十一類，共 55 卷，截至一九九六年，《報告集》共出版 56 卷。

¹³⁴ 徐旭生，《徐旭生西遊日記》（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頁 248, 262。

¹³⁵ 蔣夢麟，《西潮與新潮——蔣夢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頁 160-162。

¹³⁶ 陳明遠，《文化人與錢》（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頁 32-33。

¹³⁷ 魯迅，〈記「發薪」〉，《莽原》15 (1926)，後收入氏著，《華蓋集續編》（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 3 卷），頁 349-354。

¹³⁸ 參見〈中國學術團體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46。

¹³⁹ 參見〈西北科學考察團中國部分之旅費純依募捐為主〉，《益世報》1927.05.06，第 7 版。

羅丰

考察所需龐大費用，這點僅有的捐款無疑是杯水車薪，不過僅僅表示一種姿態而已，中國科學之羸弱可見一斑。

最終公布的中方人員名單並不是當時商定的。協議簽定後的五月五日，中國地質調查所派出的最後一名成員地質學家趙亞曾宣布放棄參加考查團。趙亞曾是當時青年一代中最優秀的地質學家，¹⁴⁰ 丁文江、翁文灝非常看重他。他的解釋是受到來自「聯合會」成員的沉重壓力，使他覺得根本無法完成翁文灝所託付的重任。¹⁴¹ 在這場探險家與中國學術界的愛國者博弈中，除去雙方皆大歡喜外，最受傷害的一方就是丁文江、翁文灝代表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後者的朋友安特生是這群人中最失望的一個。中國地質調查所在中瑞考查團中的出局，成為壓垮安特生的「最後一根稻草」，五月九日安特生於回國途中在黑龍江省的哈爾濱轉乘火車，投下給斯文·赫定的信：

對最後發生的這件事，即地質調查所在最後一分鐘被排除在外，我是極不高興的。（略）我相信，您現在完全理解，最後這場迫害運動對翁文灝和趙亞曾的傷害和侮辱有多大，而且當我說，這最後一擊讓我也感到極為痛苦的時候，我估計你也能理解我。我確實認為，現在一切都要和平與相互諒解，應該允許我帶著過去幾周給我的平靜心態消失。

地質調查所自然成了這場迫害的目標，僅僅因為它同意給我們瑞典人提供比聯合會想允許的更優惠的條件，而當我說，自 1914 年以來我就能完全和諧地一起工作的這個機構以及其中的朋友，現在卻成為這種迫害打擊的對象，實在讓我痛心，您一定會同情我。（略）但是對翁文灝和地質調查所的最後這次打擊似乎太過分了。儘管如此，地質調查所依然是中國能夠炫耀的唯一具有國際科學意義的機構。¹⁴²

不過，安特生的憤怒僅僅表現在他快速地脫離北平這個令他失望的地方，關於整個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內部鬥爭在他著名的自傳《巨龍與洋人》(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 中隻字未提。雖然，這部自傳一九二六年已經出版了瑞典文本，但是在一九三四年的英文本中安特生明確地指出，一九二七年三月他補寫了第 21 章「民族主義 (Nationalism)」。¹⁴³ 他認為當時的中國正在發生一場

¹⁴⁰ 黃汲清，〈傑出的青年地質學家趙亞曾先生〉，《地質評論》26.2 (1980)：167-169。

¹⁴¹ 楊·魯姆嘉德，《從極地到中國》，頁 172。

¹⁴² 安特生致斯文·赫定的信，轉引自楊·魯姆嘉德，《從極地到中國》，頁 172-173。

強大的民族覺醒運動，這將被後來的世界視為二十世紀歷史中最顯著的一股力量。¹⁴³ 安特生未提及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成立前後的內部紛爭，顯然是想保護在這場鬥爭中失利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和他的朋友們。

中方不但在大的方面追求平等，即使在一些小的地方也力求平衡。例如中方團員十人，需要置裝費 2,500 元。這個置裝費明確由中國各學術團體分擔，不足者向外募捐。其實各學術團體承擔的份額有限，清華學校最多也只有 250 元，北京大學只認捐 50 元，歷史博物館 150 元，古物陳列所、¹⁴⁴ 中國畫學會、北京圖書館各捐 100 元，遠遠不夠，大頭由葉玉甫捐 500 元，常翰勳捐 1,000 元。¹⁴⁵ 以二〇年代的生活水準而言，每人 250 元的置裝費顯然是一筆鉅款，斥鉅資置裝顯然是為了和外方團員的服裝保持一致。

考察計畫確定以後，北京大學在二院布告斯文·赫定的考察行程說明，並且在通告中說數學、物理科的學生尤其是氣象學的學生可自由報名，同時也要測試他們的語言能力，英語、法語是考查團的通用語言。¹⁴⁶ 來報名的數學、物理科學生就有 30 位之多，其中竟然有一名女學生也報了名。報名的學生首先接受語言測試，袁復禮等教授是考官，接著又進行數學、物理的考試。考題共有 8 道，共有 8 位同學通過了測試，然後接受體檢。最終有 4 位學生從 8 位優勝者中勝出，可以參加考查團，他們是馬葉謙、李憲之、劉衍淮、崔鶴峰。4 位都是原北京大學或正在上學的物理科學氣象的學生。¹⁴⁷ 根據李憲之的回憶：考試在北大三院的大教室進行，考生有七八十人。考試分為英語和物理，英語分為口試、筆試，筆試要求寫一篇作文。錄取後劉半農親自找四人幾次促膝長談、囑咐：「出去以後要將所見所聞詳細記錄，有些事當時可能認為沒什麼用處，以後卻可能有很大用處。」並說「要做出樣子給外國人看看，另一方面要注意不許外國人有越

¹⁴³ 安特生著，麻保金等譯，《巨龍與洋人》（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頁 312-313。

¹⁴⁴ 參見〈古物陳列所為加入西北科學考察團經過等事致內務總長的呈〉，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等，《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頁 6。

¹⁴⁵ 參見〈中國學術團體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549。文中僅稱為學生籌措助裝費，其中並不包含教授等人，以求留有他人顏面。認捐總數仍不足 2,500 元。

¹⁴⁶ 〈西北科學考查團招考學生廣告〉，《北京大學日刊》2089 (1927): 2；《晨報》1927.04.20，第 6 版，〈西北科學考查團招生〉則稱「英法德俄任考一種」。

¹⁴⁷ 斯文·赫定著，王鳴野譯，《從紫禁城到樓蘭》（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9），頁 35。

羅丰

軌行為」。¹⁴⁸ 中國方面的人員都被要求注意外國人的越軌行為，黃文弼在日記中亦記道：「故余等職務，一者為監督外人，一者為考查科學。」¹⁴⁹ 西北科學考查團對青年人才的培養有著重要的貢獻。

在考察途中，徐旭生、黃文弼等中方團員亦就外方舉動協商對策數次：

徐先生亦云，彼等（指德國團員）極欲飛行考古之成功。余以為此項絕對不能承認。因天空航路權，有關國防極巨。設許航行，則德國可直由中亞細亞，經帕米爾高原直達中國內地，不須繞海上。中國內航失于外人，至今尤為遺憾。設更將天空航路失去，門戶既闢，盜賊在室內矣。¹⁵⁰

原定五月八日出發，但因種種手續未妥不能成行，¹⁵¹ 這些手續直到八日半夜方才辦理完畢。五月九日上午中方團員齊集北京大學國學門前合影，即赴西直門車站。斯文·赫定由於行李稍有耽擱到達車站時略晚一些。周肇祥寫了一首熱情洋溢的〈新出塞曲〉，發至每個團員的手中：

天山北兮大漠南，草青青兮柳毵毵。樂莫樂兮出塞，跨駱駝兮短後衫。
逐黃羊兮射黑鶻，食梁肉兮飲酪甘。地可測兮天可量，鑿混沌兮開洪荒。
啟古鑰兮發秘藏，虛往實歸兮多寶裝。為國人兮貢獻，播簡冊兮遐方。
日月忽兮易邁，任翳重兮途長。合吾羣兮奮吾謀，同心同力兮何亞與歐。
離軫去兮情悠悠，歌以送兮樂無憂。¹⁵²

斯文·赫定眼中這個最不近情理的敵手，其內心的藩籬與隔閡，頃刻間就像一堆木樁倒塌，〈新出塞曲〉中洋溢著和諧之音。¹⁵³ 中瑞考查團的團員們在喧鬧聲中踏上西行的專列，前來送行的有各團體代表和瑞典公使館公使。¹⁵⁴ 北京大學李四光及四名學生也特地選擇同車西向包頭，以便安排學生協助袁復禮。¹⁵⁵

¹⁴⁸ 李憲之，〈回憶與前瞻〉，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399。

¹⁴⁹ 黃文弼遺著，黃烈整理，《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1。

¹⁵⁰ 黃文弼，《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頁33。

¹⁵¹ 〈西北科學考查團今日不能成行〉，《順天時報》1927.05.08，第7版。

¹⁵² 周肇祥，〈新出塞曲〉，《文字同盟》2（1927）：36-37。

¹⁵³ 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譯，《亞洲腹地探險八年》（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頁9。

¹⁵⁴ 〈西北科學考查團昨日由京出發〉，《順天時報》1927.05.10，第7版。

¹⁵⁵ 馬勝雲，〈袁復禮和李四光的友誼〉。

七・結語

從二十世紀二〇年代開始，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諸方面都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從一九二五、二六年開始中國科學界面對外國科學家以探險的名義進入中國，保持高度的警惕，有著複雜而微妙的心態。學術領袖們雖然不得不接受西方科學先進所帶來的科學界秩序的現實，但對於中國科學落後卻有著十分焦慮的情緒。斯文・赫定探險隊的到來意外地擾動了民族主義愛國學者們敏感的神經。

從斯文・赫定的角度來看，這次探險活動和他以往的探險經歷並無二致，只要選擇合適的人員，有充足的經費保障，加上自己獨一無二的探險經歷，成功會變得理所當然。更何況在來中國之前就借助著名學者安特生的影響力，與合作單位中國地質調查所進行了良好的互動溝通，並取得後者的支持。

以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和丁文江為代表的地質學家，稱得上是當時與外國科學家合作最有經驗的中國科學家。在以往的合作中重視人才的培養；在獲得成果的歸屬上，尤其是重要的、與中國歷史有關聯的材料必須留在中國；研究成果要首先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相應的刊物上發表，這些要求都體現了科學領袖廣闊的學術視野。基於其所持理念，丁文江後來對於科學受民族主義影響提出尖銳的批評：

近幾年來，許多研究科學的青年，受民族主義的影響，往往不願和外國人合作，或受外國人指導。不知道這是大錯誤的。科學原來是西歐的產物。歐美人研究科學，至少已經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我們才不過二十年。人家當然比我們高明，我們當然要與外國人合作，受外國人指導，方始有趕上人家的希望。¹⁵⁶

他們對斯文・赫定的考察計畫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希望利用這次合作機會培養地質人才，期望有重要的科學發現。在簽訂協議條款時，在既往條款的基礎上已經有所前進，迫使對方有所讓步。

深感於清末以來強權國家在中國競逐利益之害，以北京大學國學門為代表的諸多機構學者雖各有不同思考，但在當時反對列強侵犯國權，反對政府對外簽定不平等條約是他們的共同關懷。將斯文・赫定的這次探險活動等同於以前斯坦因、伯希和與柯茲洛夫 (P. K. Kozlov, 1863-1935) 的探險，是他們的基本判斷。

¹⁵⁶ 丁文江，〈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歐陽哲生主編，《丁文江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第1卷，頁105。

在斯文·赫定抵達北京不久，他們即協調立場、商量對策，準備一場激烈的反擊戰。而這時的斯文·赫定與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協議尚在醞釀之中，可以肯定地說無論斯文·赫定與翁文灝簽訂怎樣的條款協議，被反對的命運業已注定。任何形式的對外矛盾都是內部政治矛盾的延伸，也就是說各種勢力的內部鬥爭將會折射在對外行動上。當然，反對派之中亦分為兩派，其中一派堅決反對任何的對外合作，另一些人則覺得尚處幼稚期的中國科學界應該與外國科學家合作，充分利用國外的經驗，尤其是資金，培養人才，壯大隊伍。顯然在激烈的討論中後者人數雖少，但終於說服大家，宣言反對但可與斯文·赫定進行談判。另外，以目前材料所見尚不能排除一些個人因素，尤其是對丁文江、翁文灝的個人好惡在其中的作用，因此中國地質調查所被排除在中瑞西北考查團之外。正如本文在分析中指出的那樣，在特定背景下新聞媒體在整個談判活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國學術團體利用報刊向北洋政府施壓，雖然斯文·赫定成功遊說軍、政上層獲得一如既往的支持，但迫於民意壓力並不能一意孤行，只能退回談判桌前。經過兩個多月十多輪的艱苦談判，中瑞雙方終於達成一份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字協議。代表中方簽字的則是一個臨時組建的群眾團體，而非以前政府下轄的學術機構。

以往的研究過分強調斯文·赫定被動應戰，中國學術團體取得平等條約勝利的一面。通過本文以上的分析我們清楚看到斯文·赫定在整個事件中，扮演了主導者的角色，在一些艱困議題上欲擒故縱，迫使對手放棄原有打算，並在後來的考察活動中實際完全主導整個學術走向和目標。通過考察活動，斯文·赫定也與中方人員建立良好的友誼，尤其是對青年學生的幫助。斯文·赫定樂於助人，考查團員劉衍淮、李憲之留學德國期間獲得其照顧，丁道衡、陳宗器留學德國的費用也多由其資助。¹⁵⁷

只有回到當時特殊的語境中，我們才能理解他們各自的意圖。斯文·赫定與中方所達成的協議受到來自西方朋友的極力反對。德日進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談到斯文·赫定所遭遇的困境和成功後的喜悅：

赫定是一個最迷人的人，他的魅力顯然是很豐富的。但我的印象是，他和我有一種更私密化的接觸，而且是出於我沒有懷疑的原因。當他 1926 年準備去新疆時，遇到了關於科學材料上中國人敏感的主權問題，他是第一個接受中國人堅持在中國領土上進行考察和研究的條件的。我敢肯定，他在

¹⁵⁷ 劉衍淮，〈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的經過與考查成果〉，頁 85。

當時備受責難，他歐洲最好的朋友拋棄了他，指責他向中國人投降。正好這時我遇到他，勸他相信中國人，與他們密切合作。所以正像我鼓勵他的那樣，他獲得了成功，完成了漫長的考察。他至今對我心存感激，仿佛在他取得成功漫長的幾個月中，就是靠著我鼓勵的語言堅持下來，現在他已收穫成功。現在他甚至得到過去反對者的信任，他帶領的每一個人都成為他忠實的朋友，這又是一次精神信仰的勝利，或者說是美好事物的成功。¹⁵⁸

儘管斯文·赫定覺得協議的簽訂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的決策是非常英明，但他的西方朋友並不這樣認為。斯坦因對這件事大為不滿，直到一九三〇年，他還想再次前往新疆，進行探險活動。¹⁵⁹ 有證據顯示在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成立以後的日子裡，斯文·赫定曾多次出手直接或間接地與中國人聯手阻止德國艾米爾·特林克勒爾 (Emil Trinkler, 1896-1931) 中亞探險隊、美國安德思中亞考察隊和斯坦因領導的第四次中亞考察隊。斯文·赫定的這些行為，甚至被寫進英國間諜的秘密報告之中。他們的基本看法是，斯文·赫定想方設法地獨霸中國新疆的考察權利，¹⁶⁰ 排除異己力量，與中國人合作是他的唯一選擇。很明顯斯文·赫定獲得極大的成功，從二〇年代開始直至今日，斯文·赫定始終如一地得到中國學術界的正面評價，多年來學術界多次舉辦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紀念活動，出版許多著作。這在東西方來華探險家中是唯一的。

丹尼爾 C·沃 (Daniel C. Waugh) 認為由於斯文·赫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傾向於德意志帝國，以後的日子裡又在政治上傾向於納粹政權，使得他的著作在德國成為暢銷書。但受到德國人尊敬的同時，也受到越來越多其他歐洲國家學者的排斥。他覺得和斯坦因相比，斯文·赫定更受中國人的愛戴，其中的原因尚待調查。¹⁶¹ 本研究似乎可以回應這類西方學者尚有疑惑的問題。西方人則過分拘泥於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術團體之間達成協議的條文，以為中國人在協議條款

¹⁵⁸ Teilhard de Chardin,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13 April, 1929, pp. 153-154.

¹⁵⁹ 參見〈古物保管委員會關於斯坦因來華背景及目的的報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等編，《近代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1），頁 145-146，圖版 11。該報告稱：「該氏大發議論，謂我只知有舊中國，我並不管什麼是國民黨的少年中國之喊叫。國民黨最無聊，外國人應不理會，以前外國人與中國學術團體接洽合作皆是無聊，而且上當。」

¹⁶⁰ 王冀青，〈斯文·赫定與倫敦皇家地理學會關係研究〉，榮新江、朱玉麒，《西域考古·史地·語言研究新視野》，頁 155-156。

¹⁶¹ 丹尼爾 C·沃，〈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頁 295-296。

羅丰

上的勝利，就代表斯文·赫定放棄主導權，甚至投降，忽視了紙上條文與實際活動之間的差別。

斯文·赫定的目標如期實現，在他的探險經歷中，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活動是歷時最久（長達八年），成果最為豐盛的一次，中瑞雙方各類著述多達六、七十本之多，並且仍在不斷增加，雖然許多他生前並未目睹。對中國科學界來說除地質學外、生物、古生物、西北考古、氣象、航空氣象等諸多學科的建立都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有密切的關係，其合作模式影響深遠。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歷次中外合作中，無疑是最為成功的一次。¹⁶²

（本文於民國一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收稿；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了朋友朱玉麒、李旻、徐幼剛、馬強、黎鏡明、馬偉等諸位先生的幫助。另，承蒙兩位匿名審稿先生與編委會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¹⁶² 王雲，〈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四次中亞科學考察的比較〉，《敦煌學輯刊》1998.2：129-133。

引用書目

一・報紙、檔案材料

- 〈中瑞合組西北科學考查團（續）〉，《申報》1927.05.11，第7版。
- 〈北京五機關組織考古隊，考察地點為內蒙新疆〉，《順天時報》1927.04.23，第7版。
- 〈北京到柏林只要四天〉，《大公報》1926.09.03，第6版。
- 〈北京學術界極注意瑞典飛機考古〉，《順天時報》1926.11.15，第7版。
- 〈北京學術團體反對外人採取古物之宣言昨日已發表〉，《晨報》1927.03.10，第6版。
- 〈北京學術團體繼續反對瑞典遠征隊〉，《益世報》1927.03.15，第7版。
- 〈古物保管委員會關於斯坦因來華背景及目的的報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等編，《近代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1，頁145-146，圖版11。
- 〈外交要訊〉，《申報》1927.03.07，第5版。
- 〈外交要訊欄〉，《申報》1926.12.07，第4版。
- 〈外交要訊欄〉，《申報》1927.01.07，第6版。
- 〈外交雜訊〉，《申報》1927.03.01，第5版。
- 〈本館專電欄〉，《申報》1927.03.27，第6版。
- 〈各學術團體反對瑞典遠征隊，電綏新甘當局阻止前往〉，《晨報》1927.03.24，第6版。
- 〈各學術團體積極反對瑞典遠征隊〉，《晨報》1927.03.15，第6版。
- 〈西北考查科學團八日出發〉，《大公報》1927.05.04，第3版。
- 〈西北考查科學團八日出發（續）〉，《大公報》1927.05.05，第3版。
- 〈西北考察科學團定期出發〉，《益世報》1927.05.05，第7版。
- 〈西北科學考查團今日不能成行〉，《順天時報》1927.05.08，第7版。
- 〈西北科學考查團招生〉，《晨報》1927.04.20，第6版。
- 〈西北科學考查團招考學生廣告〉，《北京大學日刊》2089 (1927)：2。
- 〈西北科學考查團昨日由京出發〉，《順天時報》1927.05.10，第7版。
- 〈西北科學考察團中國部分之旅費純依募捐為主〉，《益世報》1927.05.06，第7版。
- 〈京內學術團體聯合反對瑞典遠征隊，並積極研究保存古物法〉，《晨報》1927.03.06，第6版。
- 〈東方考古學協會公開講演會〉，《史學雜誌》38.6 (1927)：607。

羅丰

- 〈教育界消息：西北科學考查團之成立與出發〉，《教育雜誌》19.6 (1927)：2。
- 〈教育部批示批字第 159 號〉，《政府公報》（北京）234 (1927)：115-116。
- 〈瑞典考古隊已首途赴新〉，《順天時報》1927.03.22，第 7 版。
- 〈瑞典考古隊另有圖謀，新晉等省來電阻止前往〉，《益世報》1927.04.03，第 6 版。
- 〈瑞典考古隊將來華，擬由天上飛來〉，《晨報》1926.11.07，第 6 版。
- 〈瑞典遠征隊又運來大批儀器，學術團體反對尚無效力〉，《晨報》1927.04.03，第 6 版。
- 〈瑞典遠征隊取道京綏，將赴甘新兩省〉，《順天時報》1927.03.13，第 7 版。
- 〈赫定聲明赴新疆所獲遺物盡增（贈）中國〉，《益世報》1927.03.13，第 6 版。
- 〈學團聯合會反對瑞典考古遠征，督促政府嚴加禁止〉，《順天時報》1927.03.12，第 7 版。
- 《大公報》1926.09.29，第 3 版。
- 《晨報》1927.03.11，第 6 版。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元 25-10，1929.01.23 李濟致傅孟真函。
-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等編，《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6。
- 斯文·赫定、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協定〉，《東方雜誌》24.8 (1927)：103-105。

二・近人論著

丁文江

- 2008 〈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歐陽哲生主編，《丁文江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 1 卷，頁 102-113。

王忱編

- 2005 《高尚者的墓誌銘——首批中國科學家大西北考察實錄（1927-1935）》，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王雲

- 1998a 〈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組成〉，《西北史地》3：89-93。
- 1998b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四次中亞科學考察的比較〉，《敦煌學輯刊》1998.2：129-133。

王新春

- 2012 〈西北科學考查團與近代中國考古之興起〉，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 7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331-356。

王冀青

- 2014 〈斯文·赫定與倫敦皇家地理學會關係研究〉，榮新江、朱玉麒主編，《西域考古·史地·語言研究新視野——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28-156。

丹尼爾 C·沃

- 2012 〈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通往一個概念的考古學〉，朱玉麒，《西域文史》第 7 輯，頁 295-31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

- 2005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伍賀庚 (Håkan Wahlquist)

- 2020 〈中文版序言〉，斯文·赫定著，王瑞譯，《從南極到北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3。

安特生著，麻保金等譯

- 2021 《巨龍與洋人》，北京：文物出版社。

朱玉麒

- 2014 〈北京大學時期的黃文弼〉，榮新江、朱玉麒，《西域考古·史地·語言研究所新視野》，頁 166-176。

李書華

- 1998 〈七年北大〉，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91-123。

李學通

- 2004 〈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原件中的爭議〉，《中國科技史料》25.2：95-105。
- 2007 〈近代中外科學合作中的權與利——西北科學考查團再認識〉，《自然科學史研究》增刊 26：43-55。

李學通編

- 2020 《翁文灝往來函電集 1909-1949：從地學家到民國行政院院長》，北京：團結出版社。

李濟

- 1927 《西陰村史前的遺存》，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 1994 〈我與中國考古工作〉，《新時代》（臺北）創刊號（1961）。後收入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 161-166。

羅丰

- 2006 〈敦煌學的今昔——考古瑣談之二〉，《自由談》（臺北）19.2（1968）。後收入張光直主編，《李濟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卷，頁60-62。

邢玉林、林世田

- 1992 〈西北科學考察團組建述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3：22-29。

周作人

- 1982 《談虎集》，收入《周作人全集》，臺中：藍燈文化事業公司，第1冊。

周珊、吳華峰編著

- 2019 《黃文弼畫傳》，北京：中華書局。

周肇祥

- 1927 〈新出塞曲〉，《文字同盟》2：36-37。

孟憲實

- 2004 〈伯希和、羅振玉與敦煌學之初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頁1-12。

哈雷特·阿班著，楊植峰譯

- 2008 《民國採訪戰——《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回憶錄》，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

洪廣冀

- 2021 〈畢士博、李濟與「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4：779-846。

胡適

- 1993 《丁文江傳》，海口：海南出版社。

夏鼐

- 1979 〈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考古》1979.3：193-196。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夏鼐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夏鼐（作銘）

- 1985 〈介紹《周口店發掘記》〉，《考古》1985.4：383-384。後以題為〈評賈蘭坡等著《周口店發掘記》〉，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文集》。

孫敦恒編著

- 2002 《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徐旭生

- 2000 《徐旭生西遊日記》，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徐炳昶

- 1931 〈敘言〉，斯文·赫定著，李述禮譯，《長征記》，收入《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北平：西北考察團印行。

桑兵

- 2001 《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海斯 (Carlton J. H. Hayes)

- 2005 《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袁復禮

- 1983 〈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中國科技史料》3：12-25。
- 2005 〈蒙新五年行程紀·卷一·十六年及十七年西行紀程〉，《地學集刊》2.3/4 (1946)。後收入王忱，《高尚者的墓誌銘》，頁 247-278。

馬思中、陳星燦

- 2002 〈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安特生致瑞典皇太子的信及其釋讀〉，《古今論衡》8：10-17。

馬勝雲

- 2003 〈袁復禮和李四光的友誼〉，發表於中國地質大學主辦，「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第 16 屆學術研討會」，北京：中國地質大學，2003.06。

馬衡

- 2020 〈考古與迷信〉，《晨報副鐫》1925.12.24。後收入《馬衡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 321-325。

張九辰

- 2005 《地質學與民國社會：1916-1950》，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張灝

- 2006 〈關於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幾點省思〉，氏著，《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頁 165-176。

許凱

- 2012 〈北京大學對故宮博物院早期事業的貢獻 (1924-1933)——以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故宮學刊》總第 8 輯，北京：故宮出版社，頁 310-322。

陳以愛

- 2002 《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 (1922-1927)》，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羅丰

陳志讓

- 1980 《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陳明遠

- 2001 《文化人與錢》，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陳垣

- 1991 《敦煌劫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星燦

- 1997 《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陶希聖

- 1998 〈蔡先生任北大校長對近代中國發生的巨大影響〉，《傳記文學》31.2 (1977)。後收入陳平原、夏曉虹，《北大舊事》，頁 44-48。

斯文・赫定著，王鳴野譯

- 2009 《從紫禁城到樓蘭》，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譯

- 1992 《亞洲腹地探險八年》，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費俠莉 (Charlotte Furth) 著，丁子霖等譯

- 2006 《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

黃文弼遺著，黃烈整理

- 1990 《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

黃汲清

- 1980 〈傑出的青年地質學家趙亞曾先生〉，《地質評論》26.2：167-169。

楊・魯姆嘉德著，萬之譯

- 2021 《從極地到中國——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傳》，北京：文物出版社。

楊新孝

- 1990 〈中國近代地質學奠基者翁文灝博士〉，王鴻禎主編，《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233-240。

楊翠華

- 1986 〈歷史地質學在中國的發展（1912-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 上：319-334。

楊鍾健

- 1934 〈論研究有地方性科學之基本工作〉，《科學》1934.1：5-11。

- 2021 〈旅瑞典雜記〉，氏著，《去國的悲哀 西北的剖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89-111。
- 賈蘭坡
- 1990 〈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王鴻禎，《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頁 56-62。
- 賈蘭坡、黃慰文
- 1984 《周口店發掘記》，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 榮新江
- 2005 〈中國敦煌學研究與國際視野〉，《歷史研究》2005.4：165-175。
- 2009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俄國考察隊與中國新疆官府〉，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 4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95-301。
- 劉衍淮
- 1975 〈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的經過和考查成果〉，《師大學報》（臺北）20：75-92。
- 1982 〈中國與瑞典合組之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1927-1933）〉，《地理學研究》（臺北）6：9-47。
- 蔣夢麟
- 2006 《西潮與新潮——蔣夢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
- 魯迅
- 1981 〈記「發薪」〉，《莽原》15（1926）。後收入氏著，《華蓋集續編》，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 3 卷，頁 349-354。
- 霍根·沃爾斯特著，李佩娟譯
- 1994 〈斯文·赫定的民族學收藏品〉，馬大正等主編，《西域考察與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頁 100-110。
- 戴光中
- 2004 《書生本色——翁文灝傳》，杭州：杭州出版社。
- 戴麗娟
- 2008 〈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95-161。
- 2013 〈中國地質學及史前學發展初期之國際性格——從德日進寄至法國的一張餐卡看起〉，《古今論衡》25：133-166。
- 羅志田
- 2001 《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羅丰

羅桂環

2009 《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綜論》，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羅桂環、徐鳳先

2007 〈20 世紀一次成功的中瑞合作科學考察——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張海鵬主編，《中國歷史上的西部開發——2005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209-219。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

1989 《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

Böhm, Hans

2003 “Finanzierung der Zentralasienexpedition Sven Hedins: ‘Strengste Geheimhaltung wird von allen Beteiligten als unerlässlich angesehen’.” *Erdkunde* 57: 40-54.

Chin, Tamara (秦大倫)

2013 “The Invention of the Silk Road, 1877.” *Critical Inquiry* 40.1: 214-219.

Dienel, Hans-Liudger, and Martin Schiefelbusch

2000 “German Commercial Air Transport until 1945.”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78.3/4: 945-967.

Fiskesjø, Magnus (馬思中), and Chen Xingcan (陳星燦), eds.

2004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Hedin, Sven

1943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art I, 1927-1928*. Stockholm: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Jacobs, Justin M.

2014 “Nationalist China’s ‘Great Game’: Leveraging Foreign Explorers in Xinjiang, 1927-193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3.1: 43-60.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1962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New York and Evanston: Harper & Row.

Explorers and Patriots: The Creation of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to Northwest China

Feng Luo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numerous Western explorers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mainland China, especially in Xinjiang. Among them was Sven Hedin (1865–1952), who launched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to Northwest China in 1927 together with Chinese academics, achieving remarkable results in many fields of research. The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Sweden was considered at the time to be the first equal bilateral agreement China had ever signed with a Western country on matters of scientific cooperation. Previous studies, however, have idealized the agree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is,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involved Chinese parties, related research has largely highlighted their efforts to defend China's rights and interests, while mistakenly portraying Sven Hedin as a foreign representative forced into agreement by the Chine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ersonal statements of both parties, their correspondences, news reports and other archival materials on the events surrounding the creation of the expedition team, thereby casting new light on a chapter in the complex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science and scholarship, one where Sino-Western cooperation is involved.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Sven Hedin had a leading role in the entire process, sometimes playing hard with his opponents in order to persuade them to give up their original plans, and in fact, he completely dominated the objectives and trajectory of the expedition.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led by Peking University, in turn, resorted to the media, student mobiliz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to put pressure on the Beiyang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as well as forcing the original partner, the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to withdraw from the expedition.

Keywords: scientific expedition; Sven Hedin; nationalism; negotiation; agreement